



治校参考 (月刊)

2020年第1期 (总第68期)

江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院编 2020年6月1日

目 录

教育资讯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	3
教育部印发指导意见——疫情防控期间做好高校在线教学组织与 管理工作.....	11
教育部印发《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有针对性地做好教师工作若干 事项的通知》.....	13
教育部发布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各级各类教育 事业取得新进展.....	15

高教视点

构建校园重大传染病应急防疫机制.....	16
----------------------	----

纪检监察怎样助力高校立德树人·····	21
警惕“一流”概念在高校建设中的泛化·····	24
博士生非学术素养受重视·····	27
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治理中的文化体系·····	31
探索面向未来的师范专业改革路径·····	34
增强大学生对不良思潮的“免疫力”·····	38
把忧患意识融入国家安全教育·····	41
劳动教育是每名大学生的必修课·····	44
高校动态	
东北师大创建教师教育新模式·····	49
思政课有备而来，教与学里应外合——记海南师范大学思政课改革·····	52
武汉大学：打好课堂保卫战·····	57
高端访谈	
深度融合是在线学习的关键——访华南师大博士生导师钟柏昌、詹泽慧教授·····	63
调查研究	
全面二孩政策下如何加快构建托育服务体系——基于全国十三个城市的调研与思考·····	68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導體制机制改革的意見》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導體制机制改革的意見》（以下简称《意見》），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導體制机制改革的意見》全文如下。

教育督导是教育法规定的一项基本教育制度。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教育督导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督导在督促落实教育法律法规和教育方针政策、规范办学行为、提高教育质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存在机构不健全、权威性不够、结果运用不充分等突出问题，还不适应新时代教育发展的要求。为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導體制机制改革，充分发挥教育督导作用，现提出如下意見。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紧紧围绕确保教育优先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优化管理体制、完善运行机制、强化结果运用为突破口，不断提高教育督导质量和水平，推动有关部门、地方各级政府、各级各类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以下统称学校）切实履行教育职责。

（二）**主要目标**。到 2022 年，基本建成全面覆盖、运转高效、结果权威、问责有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督導體制机制。在督政方面，构建对地方各级政府的分级教育督导机制，督促省、市、县三级政府履行教

育职责。在督学方面，建立国家统筹制定标准、地方为主组织实施，对学校进行督导的工作机制，指导学校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在评估监测方面，建立教育督导部门统一归口管理、多方参与的教育评估监测机制，为改善教育管理、优化教育决策、指导教育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二、进一步深化教育督导管理体制改革

（三）完善教育督导机构设置。国务院设立教育督导委员会，由分管教育工作的国务院领导同志任主任，教育部部长和国务院协助分管教育工作的副秘书长任副主任。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成员包括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民委、公安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市场监管总局、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等部门和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办公室设在教育部，承担日常工作。教育部设立总督学、副总督学，负责具体工作落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结合实际，比照上述做法，强化地方各级政府教育督导职能，理顺管理体制，健全机构设置，创新工作机制，充实教育督导力量，确保负责教育督导的机构独立行使职能。

（四）全面落实教育督导职能。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每年组织一次综合督导，根据需要开展专项督导。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负责拟定教育督导规章制度和标准。各级教育督导机构要严格依照《教育督导条例》等法律法规，强化督政、督学、评估监测职能，加强对下一级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督导，重在发现问题、诊断问题、督促整改，确保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落地生根。

（五）充分发挥教育督导委员会成员单位作用。健全各级教育督导机构工作规程，明晰相关单位职责，建立沟通联络机制，形成统一协调、分工负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相关单位要安排专门人员负责联系教育督导工作。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成员要积极参加督导，履行应尽职责。

（六）强化对地方各级教育督导机构的指导。上级教育督导机构要加强对下级教育督导机构的指导和管理。地方各级教育督导机构的年度工作计划、重大事项和督导结果须向上一级教育督导机构报告。

三、进一步深化教育督导运行机制改革

（七）加强对地方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督导。完善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体系，定期开展督导评价工作。重点督导评价党中央、国务院重大教育决策部署落实情况，主要包括办学标准执行、教育投入落实和经费管理、教师编制待遇、教育扶贫和重大教育工程项目实施等情况。各级教育督导机构要集中研究督导发现的问题，督促整改落实，确保督导发挥作用。加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认定和监测复查工作，完善控辍保学督导机制和考核问责机制。组织教育热点难点问题和重点工作专项督导，及时开展重大教育突发事件督导。

（八）加强对学校的督导。完善学校督导的政策和标准，对学校开展经常性督导，引导学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重点督导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情况，主要包括学校党建及党建带团建队建、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师德师风、资源配置、教育收费、安全稳定等情况。指导学校建立自我督导体系，优化学校内部治理。完善督学责任区制度，落实常态督导，督促学校规范办学行为。原则上，学校校（园）长

在一个任期结束时，要接受一次综合督导。各地要加强对民办学校的全方位督导。

（九）加强和改进教育评估监测。建立健全各级各类教育监测制度，引导督促学校遵循教育规律，聚焦教育教学质量。完善评估监测指标体系，加强对学校教师队伍建设、办学条件和教育教学质量的评估监测。开展幼儿园办园行为、义务教育各学科学习质量、中等职业学校办学能力、高等职业院校适应社会需求能力评估。继续实施高等教育评估，开展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严肃处理学位论文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积极探索建立各级教育督导机构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委托第三方评估监测机构和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估监测的工作机制。

（十）改进教育督导方式方法。大力强化信息技术手段应用，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开展督导评估监测工作。遵循教育督导规律，坚持综合督导与专项督导相结合、过程性督导与结果性督导相结合、日常督导与随机督导相结合、明察与暗访相结合，不断提高教育督导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加强教育督导工作统筹管理，科学制定督导计划，控制督导频次，避免给学校和教师增加负担、干扰正常教学秩序。

四、进一步深化教育督导问责机制改革

（十一）完善报告制度。各级教育督导机构开展督导工作，均要形成督导报告，并充分利用政府门户网站、新闻媒体及新媒体等载体，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开，接受人民群众监督。对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教育决策部署不力和违反有关教育法律法规的行为，要在新闻媒体予以曝光。

（十二）规范反馈制度。各级教育督导机构要及时向被督导单位反馈

督导结果，逐项反馈存在的问题，下达整改决定，提出整改要求。

（十三）强化整改制度。各级教育督导机构要督促被督导单位牢固树立“问题必整改，整改必到位”的责任意识，切实维护督导严肃性。对整改不到位、不及时的，要发督办单，限期整改。被督导单位要针对问题，全面整改，及时向教育督导机构报告整改结果并向社会公布整改情况。被督导单位的主管部门要指导督促被督导单位落实整改意见，整改不力要负连带责任。

（十四）健全复查制度。各级教育督导机构对本行政区域内被督导事项建立“回头看”机制，针对上级和本级教育督导机构督导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及时进行复查，随时掌握整改情况，防止问题反弹。

（十五）落实激励制度。地方各级政府要对教育督导结果优秀的被督导单位及有关负责人进行表彰，在政策支持、资源配置和领导干部考核、任免、奖惩中注意了解教育督导结果及整改情况。

（十六）严肃约谈制度。对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党中央、国务院教育决策部署不坚决不彻底，履行教育职责不到位，教育攻坚任务完成严重滞后，办学行为不规范，教育教学质量下降，安全问题较多或拒不接受教育督导的被督导单位，由教育督导机构对其相关负责人进行约谈。约谈要严肃认真，作出书面记录并报送被督导单位所在地党委和政府以及上级部门备案，作为政绩和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

（十七）建立通报制度。对教育督导发现的问题整改不力、推诿扯皮、不作为或没有完成整改落实任务的被督导单位，由教育督导机构将教育督导结果、工作表现和整改情况通报其所在地党委和政府以及上级部门，建

议其领导班子成员不得评优评先、提拔使用或者转任重要职务。

(十八) 压实问责制度。整合教育监管力量，建立教育督导与教育行政审批、处罚、执法的联动机制。对年度目标任务未完成、履行教育职责评价不合格，阻挠、干扰和不配合教育督导工作的被督导单位，按照有关规定予以通报并对相关负责人进行问责；对于民办学校存在此类情况的，责成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督促学校撤换相关负责人。对教育群体性事件多发高发、应对不力、群众反映强烈，因履行教育职责严重失职导致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或重大涉校案事件，威胁恐吓、打击报复教育督导人员的被督导单位，根据情节轻重，按照有关规定严肃追究相关单位负责人的责任；对于民办学校存在此类情况的，审批部门要依法吊销办学许可证。督学在督导过程中，发现违法办学、侵犯受教育者和教师及学校合法权益、教师师德失范等违法行为的，移交相关执法部门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问责和处理结果要及时向社会公布。

五、进一步深化督学聘用和管理改革

(十九) 配齐配强各级督学。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按照《教育督导条例》规定，聘任讲政治、敢担当、懂教育的国家督学。地方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教育督导队伍建设，按照当地学校数、学生数实际需要，综合考虑工作任务、地理因素、交通条件等，建设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业务精湛、廉洁高效、专兼结合的督学队伍。原则上，各地督学按与学校数 1：5 的比例配备，部分学生数较多的学校按 1：1 的比例配备。专兼职督学的具体比例由各省份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二十) 创新督学聘用方式。完善督学选聘标准，健全督学遴选程序，

择优选聘各级督学。结合教育督导职能和当前实际，探索从退休时间不长且身体健康的干部中，聘用一批政治素质过硬、专业经历丰富、工作责任心强的督学，专门从事督政工作；从退休时间不长且身体健康的校长、教师、专家中，聘用一批业务优秀、工作敬业、有多岗位从业经验的督学，专门从事学校督导工作。保证各级教育督导机构都有一批恪尽职守、敢于督导、精于督导的督学骨干力量，保证督学队伍相对稳定。

（二十一）提高督学专业化水平。完善督学培训机制，制定培训规划，出台培训大纲，编制培训教材，将督学培训纳入教育管理干部培训计划，开展督学专业化培训，扎实做好分级分类培训工作，提升督学队伍专业水平和工作能力。逐步扩大专职督学比例。强化督学实绩考核，对认真履职、成效显著的督学，以适当方式予以奖励，激发督学的工作主动性积极性。建立督学退出机制。

（二十二）严格教育督导队伍管理监督。各级政府建立对本级教育督导机构的监督制度，各级教育督导机构要完善对下级教育督导机构的监督，健全教育督导岗位责任追究机制。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断提高教育督导队伍政治素质。加强职业道德建设，确保督导人员恪守职业操守，做到依法督导、文明督导。严格执行廉政纪律和工作纪律，督促各级督学坚持原则，无私无畏，敢于碰硬，做到忠诚、干净、担当。严格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对督学的违纪违规行为，要认真查实，严肃处理。公开挂牌督学的联系方式，接受社会监督。

六、进一步深化教育督导保障机制改革

（二十三）加强教育督导法治建设。完善教育督导法律法规，加快相

关规章制度建设，推动地方出台配套法规政策。强化程序意识，细化工作规范，完善督导流程，使教育督导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工作都有章可循。

（二十四）切实落实教育督导条件保障。各级政府应将教育督导工作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由教育督导机构统筹使用，按规定妥善解决教育督导工作人员尤其是兼职督学因教育督导工作产生的通信、交通、食宿、劳务等费用。各级政府要在办公用房、设备等方面，为教育督导工作提供必要条件，保证教育督导各项工作有效开展。

（二十五）加快构建教育督导信息化平台。整合构建全国统一、分级使用、开放共享的教育督导信息化管理平台，逐步形成由现代信息技术和大数据支撑的智能化督導體系，提高教育督导的信息化、科学化水平。

（二十六）加强教育督导研究。围绕教育督导领域重大问题，组织开展系统深入研究，提出改进完善建议，加强政策储备。采取适当方式，重点支持有关高校和科研机构持续开展教育督导研究，培养壮大教育督导研究力量。

七、工作要求

（二十七）加强组织领导。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要充分认识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導體制机制改革的重要意义，按照本意见确定的目标和任务，加强组织协调，抓好落实。地方各级政府要结合实际，研究提出具体落实措施。

（二十八）加强督导检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要加强对本意见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落实情况要作为对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主要负责人进行考核、奖惩的重要依据。对落实工作成效显著的责任单位及负

责人，按照规定予以表彰；对落实不到位的责任单位依法依规进行责任追究。

（新华社，2020年2月19日）

教育部印发指导意见——疫情防控期间做好高校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

近日，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对高校正常开学和课堂教学造成的影响，教育部日前印发《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采取政府主导、高校主体、社会参与的方式，共同实施并保障高校在疫情防控期间的在线教学，实现“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

《指导意见》指出，各高校应充分利用上线的慕课和省、校两级优质在线课程教学资源，在慕课平台和实验资源平台服务支持带动下，依托各级各类在线课程平台、校内网络学习空间等，积极开展线上授课和线上学习等在线教学活动，保证疫情防控期间教学进度和教学质量。

《指导意见》明确提出9项工作任务：一是面向全国高校免费开放全部优质在线课程和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资源。截至2月2日，教育部组织22个在线课程平台免费开放在线课程2.4万余门，覆盖了本科12个学科门类、专科高职18个专业大类。二是立即制定疫情防控期间在线教学实施方案，提高教学效率、保证教学质量、完成教学任务。高校要合理调整、统筹安排春季学期与秋季学期课程教学计划。当前暂停所有寒假社会实

践。三是保证在线学习与线下课堂教学质量实质等效。要公布课程资源质量要求、在线教学课堂纪律和考试纪律要求、学生学习评价措施等管理措施。引导教师开展线上教学活动，进行学习考核。与课程平台建立教学质量保障联动机制，了解学生在线学习情况。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高校，加快研发一批有特色、代表性强、数量充足的在线试题。四是发挥“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示范引领作用，课程负责人和团队要上线提供全程教学服务，带动全国慕课教师团队开展线上教学服务。五是全天候开放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共享平台，免费提供 2000 余门虚拟仿真实验课程资源。六是倡导社会力量举办的在线课程平台免费提供优质课程资源，为高校制定丰富多样的在线教学解决方案，支持教师利用慕课等在线教学资源自主开展在线教学，鼓励开展网上在线教学培训。七是继续组织在线教育机构研发多样化在线教学解决方案，为高校选择资源和技术服务提供便利。八是发挥专家组织指导、整合、协调作用。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要整合名校名师名企力量，推动快速上线一批前期有工作基础的优质慕课和实验课程。慕课联盟联席会要与高校有组织地开展多种形式协同教学。九是加强疫情防控知识宣传，鼓励慕课平台开设有关流行病学、传染病学的慕课专题，提高大学生及社会公众的科学防控能力。

《指导意见》要求，高校要将慕课教师以及承担教学任务的所有任课教师线上教学计入教学工作量。引导学生在疫情防控期间积极选修线上优质课程，增加学生自主学习时间，强化在线学习过程和多元考核评价的质量要求。制定在线课程学习学分互认与转化政策，保障学生学业不受疫情影响。

《指导意见》强调，高校要择优选取符合本校实际、与网络环境条件相匹配的方案，与课程平台密切配合、规范管理，强化对课程内容、教学过程和平台运行监管，防范和制止有害信息传播，保障在线教学安全平稳运行。

《指导意见》同步发布了 22 家在线课程平台在疫情防控期间支持高校在线教学服务方案信息。

（《中国教育报》2020 年 2 月 6 日，作者：余闯）

教育部印发《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有针对性地做好教师工作若干事项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要指示精神 and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日前，教育部印发《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有针对性地做好教师工作若干事项的通知》，要求各地各校有针对性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教师工作，对指导教师积极有效开展应对工作进行部署。

《通知》指出，要加强对教师群体的疫情防控工作。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要严防死守，始终把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从严从紧做好学校疫情防控需要返校教师的妥善安排，不得组织教师参加线下集中面授培训、集中职称评审、大型会议等集聚性活动，确保教师立足教育教学岗位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通知》强调，要加大对在防疫一线作出突出贡献教师的激励表彰力

度，做好对防疫一线医护人员子女的关怀工作。支持高校改革创新医药卫生等相关学科领域教师科研评价办法，鼓励专家团队和领军人才集智攻关；大力宣传和表彰奖励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教师特别是高校医学院和附属医院中的优秀教师典型，在职称评审、评优评先、绩效分配等方面予以政策倾斜；及时掌握了解防疫一线医护人员子女的学习生活困难，因地制宜对防疫一线人员特别是一线医护人员子女进行看护和教育，为一线人员解除后顾之忧。《通知》同时明确，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要指导教师做好自我调适，对学生深入进行健康理念和自我保护教育，做好心理疏导和教育引导工作。

《通知》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要做好“停课不停教、不停学”组织部署工作，结合当地线上教学平台和各校实际，因地制宜组织教师开展在线教学，注意青少年身心健康，不得违反相关规定安排教师超前超限超纲在线教学，教师承担在线教育教学、在线辅导答疑、作业批改等计入工作量，纳入绩效管理。同时，做好教师信息技术能力提升和师训资源开放共享工作。

《通知》还对国培计划、特岗计划、教师表彰奖励名额等向疫情严重省份倾斜支持等对湖北省等疫情严重地区教师的支援帮扶工作作出明确规定。

（《中国教育报》2020年2月15日，作者：柴葳）

教育部发布 2019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取得新进展

近日，教育部发布 2019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对去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各项数据作了全面统计。

统计数据显示，2019 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 53.01 万所，比上年增加 1.13 万所，增长 2.17%；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在校生 2.82 亿人，比上年增加 660.62 万人，增长 2.40%；专任教师 1732.03 万人，比上年增加 59.18 万人，增长 3.54%。

通过对比统计公报不同年份的数据可以发现，全国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近年来稳步提升，2019 年又取得了新进展。比如，2019 年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 83.4%，比上年提高 1.7 个百分点；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 99.94%，小学大班额比上年减少 6.36 万个、超大班额比上年减少 6444 个；初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102.6%，比上年提高 1.7 个百分点；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89.5%，比上年提高 0.7 个百分点；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51.6%，比上年提高 3.5 个百分点。

统计公报发布了各学段统计数据。其中，学前教育阶段，全国共有幼儿园 28.12 万所，在园幼儿 4713.88 万人，比上年增长 1.23%；义务教育阶段，全国共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21.26 万所，在校生 1.54 亿人，专任教师 1001.65 万人，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94.8%；高中阶段教育，全国高中阶段教育共有学校 2.44 万所，在校生 3994.90 万人，比上年增长 1.53%；高等教育阶段，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 2688 所(含独立学院 257 所)，在

学总规模 4002 万人。

统计公报显示，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有 1426.96 万人。其中，在小学就读 1042.03 万人、在初中就读 384.93 万人。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学校 2192 所，特殊教育学校共有专任教师 6.24 万人，招收各种形式的特殊教育学生 14.42 万人，比上年增长 16.76%；特殊教育学校在校生共有 79.46 万人，比上年增长 19.32%。

统计公报显示，普通小学（含教学点）和初中，体育运动场（馆）面积达标学校、体育器械配备达标学校、音乐器材配备达标学校、美术器材配备达标学校、小学数学自然实验仪器达标学校、初中理科实验仪器达标学校，各项比例比上年均有提高。

统计公报还显示，全国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 19.15 万所，占全国比重 36.13%，招生 1774.33 万人。各类教育在校生达 5616.61 万人。

（《中国教育报》2020 年 5 月 20 日，作者：林焕新）

构建校园重大传染病应急防疫机制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各级各类传染病预防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我国传染病总发病量整体呈降低趋势。近年来，非典型性肺炎、甲型 H1N1 流感、人感染禽流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等重大传染病相继出现，给我们带来了深刻教训，同时也对纵深推进我国新时代健康卫生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据教育部统计，截至 2018 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 51.88 万所，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在校生 2.76 亿人。学校是一种特殊的人员密集场所，学生具有基数大、多群居等特点，是传染病易感染人群。面对各种重大传染病的威胁，我们应着力建构校园应急防疫机制。

校园重大传染病防控形势严峻

据《卫生学大辞典》，病原生物感染引起的疾病称为感染症，感染症中有人传人或由动物传给人以及相继传播的感染症则称为传染病。较一般传染病而言，重大传染病更具有突发性、未知性、致命性等特征，一旦暴发，传染力强、传播范围广、人群易感性高、致死率高且应急治疗措施十分有限。历史上，鼠疫、霍乱等传染病都曾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损失和灾难性影响。新近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则是现实版的教科书，催人警醒。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还提出了“加强公共卫生防疫和重大传染病防控”的具体要求。作为特殊的人群密集场所，学校一旦发现重大传染病，如果没有快速处置，极易久“病”成“疫”，造成人员伤亡、心理恐慌、教学秩序混乱等不良影响。新近突发的重大传染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目前确诊病例包括来自学校的学生群体。当前，校园重大传染病防控形势严峻。

构建校园重大传染病应急防疫机制迫在眉睫

探索构建校园重大传染病应急防疫机制，是维护学校正常秩序、保障

学生学习生活的现实需要，更是国家重大卫生疾病防控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校园防疫形势不容乐观。

学生疾病防范意识有待提高。据中国科普研究所等相关数据，2018年包括学生群体在内的网民搜索“健康与医疗”方面主要包括“癌”“腰间盘突出”“纤维瘤”等治疗疾病范畴，轻视对重大传染病预防的关注与搜索。据新闻媒体报道，“非典”时期教育部发布了限制高校学生离校通知后的第二天，在北京飞往长沙的某航班上，231名乘客中有九成是匆忙逃离的大学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传播蔓延过程中，安徽省境内5名大学生与来自疫情重灾区湖北武汉1名大学生聚会，6名大学生最终全部确诊……这些事件凸显了学生重大传染病防范意识和整体科学素养不高，校园传染病防控工作不容乐观。

法律法规可操作性亟待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于传染病预防、疫情控制等方面有明确规定，《学校卫生工作条例》《普通高等学校传染病预防控制指南》等也对学校在传染病预防、健康教育、医护配备等方面有支撑性规定。但因这些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有待增强，各地在落实过程中与规定时有脱节；缺少监管方法、责任划分、事故追究等责罚和细化规定，致使各级教育部门、学校落实难度较大。

健康教育保障力度急需强化。大中小幼各阶段学校如果轻视传染病特别是重大传染病预防的知识科普，将致使学生预防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欠缺。相关资料显示，全国统一的传染病防控教材尚属空白，部分地区、部分学校还占用包括传染病防控在内的健康教育课时；除北京、上海外，很多省份为学校配备专职卫生技术人员的比例不足。另外，医科大学以外的

高等院校，尽管拥有丰富的教育资源和强大的研究能力，但是在校园重大传染病防治方面的研究成果少之又少。

探索构建高效有序的校园重大传染病应急防疫机制，迫在眉睫、意义重大。

构建校园重大传染病应急防疫机制要找好着力点

构建校园重大传染病应急防疫机制，可从以下方面着力。

构建规范的校园重大传染病防疫预警机制。相关部门应提请全国人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进行修订，对于校园重大传染病的监管方法、责任划分、事故追究等方面予以追加并细化，切实保障重大传染病防控在责任上、效能上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应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在偏远地区，指导、督导大中小幼各阶段学校建立规范化的校园重大传染病防疫预警机制。具体来说，应成立重大传染病领导小组，明确相关目标与责任；严格按照《学校卫生工作条例》《普通高等学校传染病预防控制指南》等规定操作，将包括重大传染病教育在内的健康教育纳入教学计划；按照学生人数 600：1 的比例配备校园专职卫生技术人员，并定期采购和补给医用物资等。

与此同时，各级教育部门应定期会同卫生健康、应急管理、公安等部门对大中小幼各阶段学校开展重大传染病应急演练，确保预警机制能够决策迅速、启动及时。此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等部门应当鼓励科研人员开展校园重大传染病的防治研究、传染病知识教材的编写及科普工作，进一步提升校园应对重大传染病的预警能力。

强化全面的校园重大传染病防疫处置能力。快速响应、集中精力、科

学调度，是校园重大传染病处置过程中的基本原则。学校突发重大传染病后，相关部门应结合实际，科学研判、果断决策，在最短时间内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优途径，通过隔离等手段控制重大传染病疫情的蔓延和发展。与此同时，充分运用自身储备的专职卫生技术人员等应急力量，展开必要的紧急医救、防疫科普、疫情监控，并将校内情况通报所在党委政府、职能部门及新闻媒体、行业协会，寻求外部医疗、物资等方面的援助。在此过程中，强化信息披露与心理辅导，消除由于不当谣言带来的学生恐慌。此外，如果疫情发端于寒暑假并持续蔓延，可以采取延长假期的方式，让学生错峰返校，确保源头治理，确保假期后学生返校无交叉感染；探索常规课程网络教学的方法，减少并消除进一步在校园传染扩散的可能性。另外，教育部门还可以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探索购买民营教育机构的重大传染病预防等应用型网课并免费向学生开放。

健全完善的校园重大传染病防疫评价体系。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专家曾提出，到 21 世纪中叶，没有任何一种灾难能像心理危机那样给人们带来持续而深刻的痛苦。重大传染病会给学生心理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要为受到重大传染病侵袭的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确保能够帮助学生重新建立或恢复到重大传染病暴发前的状态，使之能够正常生活与学习。定期或在重大传染病疫情结束之后对大中小幼各阶段学校重大传染病常规防疫成效进行问卷与实地调查，并通过各种形式对校园重大传染病应急预警能力、处置能力以及软硬件条件等方面作出评价，倒逼强化自身应急防疫体系建设，更好地服务于校园传染病防控工作的长足发展。

（《中国教育报》2020 年 2 月 6 日，作者：浦天龙）

纪检监察怎样助力高校立德树人

纪检监察作为高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校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过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在新形势下，高校纪检监察应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监督为引领，深化运用“四种形态”，做实做细监督职责，健全巡察机制全面查找问题，抓好廉政教育，培育师生廉政文化，有效助力“三全育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综合改革，为高校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保驾护航。

高校纪检监察在“三全育人”综合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

纪检监察有效参与，是“三全育人”的题中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聚焦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教育部办公厅出台了“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建设要求和管理办法，启动改革试点，将“三全育人”细化为十大育人体系，并要求高校充分挖掘每一个岗位的育人元素。高校纪检监察机构是学校重要的党政机关之一，肩负着监督执纪问责、廉政教育等重要职责，也当然是育人体系的组成部分，理应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充分挖掘育人元素，有效发挥管理育人、服务育人、文化育人等育人功能。

纪检监察有效参与，是“三全育人”综合改革的重要保障。科学高效的纪检监察工作，能够保障学校保持良好的育人环境，为“十大育人”体

系有效运转保驾护航。

高校纪检监察有效助力“三全育人”的现实性和紧迫性

目前高校贯彻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时，还需要克服一些困难，重要原因就是党的纪律还存在未得到严格遵守的情况。

高校是意识形态的前沿阵地，个别教师和党组织党员干部对意识形态不重视，个别党员教师、党员干部忽视理论学习，在坚守意识形态阵地方面缺少理论功底和责任意识，导致目前高校在引领大学生思想成长方面，存在一些较为明显的问题。

高校育人的政治生态环境还需要进一步改进，高校育人的廉洁环境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师德师风及工作作风与“三全育人”的要求在一些方面还存在差距。这些现象，与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要求格格不入，如不能及时得以改观，势必影响“三全育人”改革进展和改革效果。

纪检监察工作有效助力“三全育人”的实现路径

纪检监察工作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强化政治纪律执纪监督，夯实高校“三全育人”的政治基础。

政治生态良好，党内风气就正、人心就齐、干劲就足，高校人才培养和“双一流”建设等各项事业就能蓬勃发展。高校纪检监察要督促各级党组织和广大教师干部把“两个维护”落实到实际行动上、课堂上、业务工作中，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中央对高等教育的要求变为现实，确保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正确政治方向。

监督执纪问责是纪检监察机关的基本职责。党的十九大修改的《中国

共产党章程》增加了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表述，赋予了“四种形态”新的时代内涵和工作要求。高校纪检监察必须按照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建设总要求，以保障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己任，忠诚履职、稳中求进，在运用“四种形态”上深化拓展、探索创新，切实形成监督与接受监督的浓厚氛围和良好习惯，更好地为“三全育人”综合改革保驾护航，为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良好的政治保障。

要健全校内巡察制度，主动发现并坚决整改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相背离的问题。突出政治纪律巡察，突出育人导向，着眼防范重点领域、重要岗位和关键环节廉政风险，解决问题，用好成果，举一反三。

合力抓好廉政教育，培育师生廉政文化。廉政文化具有价值引领作用，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部分，是抵制腐败文化的有效武器。廉政教育和廉政文化的推进是一项系统化工程，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能仅仅局限于警示教育。一是要把理想信念教育放在首位，理想信念是精神之钙，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得“软骨病”，就会在风雨面前东摇西摆。二是采用多种形式进行宣传学习，廉政文化建设要针对不同的对象分别进行，将廉政文化教育融入课堂教学、师生组织生活、学生校园文化建设，逐步扩大廉政文化阵地，压缩腐败文化土壤。三是要对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进行研究诠释，丰富廉政文化理论，在师生中加强并巩固廉政文化形象。

总之，高校纪检监察工作应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从监督执纪问责以及廉政文化培育等方面助力高校“三全育人”综合改革的开展。

（《中国教育报》2020年2月6日，作者：蒋涛）

警惕“一流”概念在高校建设中的泛化

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人们通常会根据对高等教育客观规律和发展实践的不断认识而产生一些概念，而这些概念会进一步形成一种思维惯性并反过来指导相应政策制定与实践活动。“一流”就是近年来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内逐渐形成的一个概念，特别是随着“双一流”建设如火如荼地开展之后，更是成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政策制定与实践办学的核心和关键词。

根据汉语大辞典的解释，“一流”乃形容事物的等级和类别。有一类、一个流派、一个上层的区间等意。那么，“双一流”所谓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即为代表一类大学与学科，一个流派的大学与学科，抑或是在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所处的上层区间。因此需要对“一流”概念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作出准确理解并明确适用范围。

“一流”概念体现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奋斗方位

事实上“一流”概念应用于高等教育体系并冠之以“世界一流大学”其实是中国的原创，特别是进入 20 世纪随着“211 工程”“985 工程”陆续推出以来，并最终演绎成全球范围内通行的一个流行词汇“World-Class University”。但世界一流大学的门槛究竟有多高，其指标体系究竟是什么，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一流”本质上是一个比较性概念，即在一定范围内的大学之间按照一定的可比指标进行比较后，处于前列者则可称之为一流。一流并非绝对性概念，而是一个相对性概念。因此，“一流”概念应用于我国高等教育

发展体系有其合理性，体现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阶段和奋斗方位，即从世界高等教育体系可比指标体系下看，我们还处于相对较为落后的地位，需要通过若干年的奋斗努力逐渐赶上并反超世界先进高等教育发展体系。

“一流”概念的泛化带来办学实践的迷茫

如前文所述，“一流”主要是一个比较性概念，按照横向的比较范围界定，我们可以演绎出“世界一流”“国家一流”“区域一流”甚至“城市一流”等概念。按照纵向比较内容界定，我们可以有“一流大学”“一流学科”“一流本科专业”“一流课程”“一流师资生源”等概念。而如果将两者进一步交叉演绎，则会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概念内涵，诸如“世界一流本科专业”之概念。事实上，在横向可比范围内，并无本科专业的世界一流比较，因为对于世界一流大学来讲，某本科专业其本身其实是相关高质量课程的组合，在此背后是高品质学科及交叉学科研究的结果。因此，对于世界一流本科专业建设来说，如果离开对相关前沿学科研究领域的追踪与发展，其本质无异于缘木求鱼。

而在我国现行体制下，办学者的话语权与资源获取能力往往与各种项目密切挂钩，所以各办学主体也不会拒绝各种冠名为“一流”的机会。但在此过程中，切不可盲目按照世界可比指标作为确定自身办学模式的依据。一方面需要严格按照办学目标确定相关办学要素，如课程设计、师资结构等，另外还有一些具有中国特色且中国独有的办学主体或内容是难以进行量化比较并产出所谓一流成果，如果一味强调世界一流比较办学价值导向，就会导致对忽视自身优势特色而不可避免地被动卷入到世界可比指

标体系。如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的研究，对具有中国独特性自然科学问题的探索等。对于这些办学主体或内容来说，更应该强调其引领型和独特性。

严格限定“一流”概念的适用范围

对于相关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的大学或学科来说，当然要积极向世界先进高等教育体系靠近，争创世界一流。但是更多的大学或学科没必要盲目追求世界一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基于国情、省（市）情和校情办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类型或开创相应学科流派，同样也可谓之一流。

此外，还要严格限定“一流”概念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之内的适用范围。一方面从横向可比范围来看，除了可以将少数大学与学科范围扩大到世界高等教育体系进行比较并努力创建一流外，我国绝大多数大学与学科都没必要盲目纳入到这个体系之内，因为这既会带来办学资源的浪费，也会带来因办学目标的盲目拔高，而导致办学质量难以保证并丢失办学特色的问题。另一方面从纵向可比内容上看，同样要严格限定在世界高等教育体系内的比较内容，因为有些办学内容是无法简单进行世界比较的。此外，还包括一些办学要素也无法简单进行比较，比如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治理体系、大学文化等。而对这些非可比要素的优化与提升，同样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达成“双一流”建设目标的重要内容。在“双一流”建设政策制定与实践办学过程中，同样不可忽视，更不能滥用国际可比指标进行引导甚至误导。

总之，“双一流”建设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以世界先进高等教育体系

为标的制定相应赶超政策，这在我国现阶段具有合理性，也是一种重要的方法。但在此过程中，要加深对“一流”概念内涵的深刻理解，既不能失之偏颇而误读，更不能被滥用。在政策制定和办学实践活动中，需要根据不同办学主体和内容精准施策，走不同发展之路，共同为中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作出各自贡献。

（《中国教育报》2020年2月17日，作者：伍宸）

博士生非学术素养受重视

欧洲大学协会日前发布了一项调查报告《当今欧洲的博士生教育：方法和制度结构》。该调查涵盖32个欧洲国家的311所博士生培养机构，涵盖了欧洲大部分的高等教育机构。该报告显示，为了应对社会转型，欧洲高等教育机构的博士生培养在注重学术研究的同时，也不断鼓励博士生的技能转化和迁移。

教育改革：关注博士生未来的非学术职业路径

该报告指出，博士生教育改革是在高等教育剧烈转型的背景下发生的。这一改革既带来了越来越高的期望，又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当下，随着知识社会的不断演进，博士毕业生的职业机会已经发生改变。除了为学术职业做准备外，毕业生日益进入非学术的职业路径，以满足企业对高素质员工的需求。对于博士生而言，这意味着除了发展研究技能外，还需要适当地发展横向（也称为“通用”）技能和胜任力。同样，博士生培养

机构对此变化需要作出回应。

此外，鉴于博士生教育的日益复杂性，培养机构需要承担额外的责任。其目标是，在实现机构目标的同时，要确保这些处于早期职业生涯的研究者，其博士生阶段就应成为一生中富有生产力的阶段。培养机构新的责任还包括制定新的程序以避免和解决参与者之间可能的冲突，以及确保整个博士生教育阶段的透明性和公开性。

调查发现：近半机构重视博士生的知识增值能力

此次调查内容包括欧洲博士生教育的组织结构、培养与活动、职业发展、资助、流动、完成毕业论文所花时间、指导、申请与入学、毕业率等。

就组织结构而言，超过六成的欧洲大学都有专门的机构负责博士生教育，具体内容包括开发课程、确保质量、制定规章制度等。但是，跨校之间管理博士生教育的机构很少，只占 13%。此外，博士生教育主要在学系或学院层面开展，按照主题或社会挑战（例如水管理、能源、移民）而开展博士生教育的仍是少数，只占 14%。

就培养与活动而言，在博士生教育的关键方面，如必修课程、培养活动的评估、课程内容、学分等，欧洲大部分高校都制定了规章制度。在博士生培养方面，大部分高校关注的核心仍然是科研能力的培养，包括先进的研究方法、新技术、基金申请写作、论文发表等。但是，博士生非学术技能的培养，也日益受到高校的重视。例如，47%的高校重视博士生的知识增值能力，如知识产权、创业精神、产品开发；37%的高校重视博士生的管理与领导胜任力，如团队精神、冲突管理；此外，45%的高校重视博士生的教学胜任力。

就职业发展而言，78%的受调查大学表示，博士生教育“总是”或“在很大程度上”为未来一代的学者做准备。不过，考虑到博士生招生数量的增加，学术以外的职业道路也被考虑其中。53%的大学强调了培养高技能知识型员工的重要性，52%的大学为学术以外的研究岗位做准备。

就财政资助而言，公共资源是欧洲大学最主要的资金来源。48%的大学表示，国家公共资源“总是”或“在很大程度上”为博士候选人提供财政支持；43%的大学表示，提供大学雇佣、大学补助和奖学金等。然而，在11%的受调查大学中，有相当多的博士生表示没有得到任何经济支持。

就流动而言，欧洲大学的大多数博士生都在同一个国家，甚至经常在同一所大学完成高等教育并获得研究学位。53%的博士生继续在他们最初获得资格学位的院校进行研究。27%的博士生转移到同一个国家的另一所机构，20%的博士生开始在另一个国家的机构进行研究，这使得欧洲大学的国际化程度较高。

就毕业论文完成所花时间而言，在4年内完成的占51%，4—5年完成的占37%，5年以上完成的占12%。与10年前相比，43%的高校认为平均完成博士论文的时间有所降低，42%的高校认为持平，15%认为有增加。

就博士生指导而言，欧洲大部分大学在导师任命（89%）、博士候选人正式报告（86%）、导师对博士候选人的反馈（73%）、博士候选人与导师或机构的书面协议（64%）、导师与博士候选人冲突（59%）、与导师最少会面次数（52%）等方面都制定了规章制度。但是，针对导师强制性培训出台制度的高校较少，仅有17%。

就博士生的申请和录取而言，73%的高校要求面试，64%的高校要求提

交研究计划，52%的高校要求展示研究想法、39%的高校要求提交推荐信，27%的高校要求参加入学考试。

就决策过程而言，欧洲大学博士生教育的决策参与程序主导方式是自下而上的。大学的亚单元（院系）几乎参与到决策程序的各个方面。例如，在遴选程序（如提交研究报告、面试）上，大学亚单元的参与占84.1%；在候选人的挑选上，这一比例为91.7%；在导师规则制定上，这一比例为77.9%；在博士生培养必修课程上，这一比例为86.2%。当然，导师和学校层面在决策程序上也有一定的发言权，但不占支配地位。相对而言，国家层面的决策参与就更小了。

就毕业率而言，66%的高校表示其博士生能在6年内毕业；与10年前相比，16%的高校认为这一数字有所降低，49%的高校认为持平，35%的高校认为增加。

就质量保障而言，88%的大学在其博士生项目建立了内部质量保障系统，61%的大学还有外部评估机构。而衡量博士生教育质量的指标包括学术发表（76%）、博士候选人毕业率（72%）、员工质量（66%）、博士候选人满意度（54%）、国际化水平（53%）等。

发展趋势：学术伦理和群体多样化将是战略重点

该调查报告指出，博士生教育的经费资助、学术伦理以及博士候选人群体的多样化，将是欧洲各大学优先考虑的战略重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研究伦理和诚信第一次出现在欧洲大学协会发行的有关博士生教育的出版物上，这表明当下欧洲大学的研究伦理与诚信问题变得更加重要。此外，博士生的职业发展、性别平等、开放获取或开放科学、博士生的健康或福

利等也是欧洲大学未来会考虑的战略重点。而在博士生教育中的校企合作、社会参与方面，尽管欧洲各大学都认为重要，但并不是最优先的关注方向。

（《中国教育报》2020年2月28日，作者：黄英）

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治理中的文化体系

当前，加快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治理体系，是推动“双一流”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高校内涵式发展的根本保障。大学文化体系已成为现代大学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学文化体系建构需要不断地结合学校办学历史、学科优势、文化底蕴进行实践探索，更需要从理论视角探究其精神、制度、物质、行为等维度的内在机理、组合效应以及如何构建的方法论。

现代大学治理体系是一个新的治理生态，笔者从这个视角以山西财经大学为例透视财经类院校特有文化属性及其文化体系，对于涵养师生文明素养、提升师生对治理体系的认同感、优化财经类院校治理结构、提升治理效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为大学文化建设的优化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精神文化是构建大学文化体系的核心

大学精神文化体现了大学的信念目标、价值取向、群体意识和精神气质等，是学校文化建设的灵魂。学校精神文化建设要着重构建以人为本的

人文精神、崇尚学术的科学精神、追求卓越的超越精神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一要培育共同核心价值观。积极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凝练形成师生广泛认同的价值取向，是学校办学方向的必然要求，是理想信念的集中显现。二要弘扬先进办学理念。精神文化建设要和学校的优良传统和办学理念相融合，同时要加强对办学历史的梳理，重视校史资料征集和《校史》编写工作。三要凝练践行符合精神特质的校训。校训是高校经过长期实践总结凝练出符合本校特质的师生共同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四要培育优良的校风教风学风。在学校进入内涵式发展的新阶段，用心培育和大力发扬优良校风，让校风成为师生员工工作、学习的共同要求和规范。

制度文化是构建大学文化体系的保障

大学制度文化是贯串大学内部运行、连接大学与外部关系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条例、规定、管理制度，是全体师生员工共同制定、共同维护、共同遵守的一系列权利、义务、责任的综合。

一要坚持依法治校。恪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国家法律法规，建立以遵循《山西财经大学章程》为核心的学校法规体系，形成党委领导、校长治校、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现代大学管理模式和科学决策、制度完备、运行高效的工作机制。二要加强民主管理与监督。健全教代会制度，充分发挥教职工的参与权、知情权、监督权；坚持做好党务校务公开；加快完善学术组织建设；厘清界定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的边界，并建立协调运行机制，促进大学的繁荣与发展。三要完善管理规章制度。确立

科学规范、以人为本的现代大学规章制度体系，不断优化常委会和校长办公会议事制度及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党建思政等各项工作制度，切实达到规范标准和提高效能的目标。

物质文化是构建大学文化体系的基础

大学物质文化是大学文化的物质形态和办学实力的集中表现。

一要重视文化设施的建设。不断优化教学设施，完善楼、馆、路、园等命名，赋予每一个建筑育人功能；设计、建设和运用好学生文体、科技活动场所，加快校园文化活动设施建设，为学生开展校园文化活动提供必要条件。二要重视校园人文景观设计。加强校园特别是新校区的规划设计，使校园人文环境既能展示厚重的历史积淀，又能体现时代价值；做好绿化美化工作，使大学校园的园、林、景等达到应用、育人、审美的有机融合；合理布局校友捐赠物品陈列，营造品味高尚的人文景观氛围，强化师生对学校的归属感。三要打造学校形象文化。形象文化设计要遵循体现大学厚重与底蕴、彰显包容与多元、展示活力与思想的原则，要积极完善《山西财经大学视觉识别系统》，规范使用校徽、校旗、校歌、学校标准色以及学校名称，规范使用学校各类指示牌、名片、文化宣传材料、学校礼品等，逐步完善具有财经大学特点的形象标识体系。

行为文化是大学文化体系的展示

大学行为文化是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被师生员工广泛认同并升华为该群体的价值理念，最后内化为个体的思想而显现为群体的行为，是现代大学治理水平的外在表现。

一要加强教工行为文化建设。要紧紧扭住“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

不松手，大力弘扬政治坚定、品德高尚、学识渊博、勇于奉献的师德风范，积极开展“良师益友”好老师、“从事教育工作 30 年荣誉奖”、“晋阳学者”等评选工作，树立尊师重教校园文化。二要加强学生行为文化建设。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升思想道德素养，积极规范大学生行为，营造良好的学习育人风气。深入开展文明校园创建活动和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活动，努力养成良好的文明行为，不断提高校园的文明水平和学生的文明素养，潜移默化提升大学生自我管理的能力。三要深化行为引领，建立学校礼仪规范。积极打造一校多品、一院一品的校园经典文化品牌，规范各项重大仪式，将各种学术活动、文化活动、庆典仪式制度化、规范化，用活动引领师生行为价值，激励师生珍视荣誉。

（《中国教育报》2020 年 3 月 2 日，作者：甄德酉）

探索面向未来的师范专业改革路径

高校师范专业是基础教育教师后备人才培养的摇篮。近年来一些省市推出新时代新师范建设方案，同时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这些举措推动了高校尤其是师范院校的教师教育工作，但一些问题也逐渐凸显，例如师范类专业如何界定，目前的师范专业是否能够适应我国教育的现实需求，是否能够满足面向未来的基础教育教师培养需要等等。优化师范专业结构和布局，探索师范专业改革，逐渐成为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不得不高度重视的问题。

打通高校师范专业学科壁垒

2001年开始的新世纪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研制并颁布了科学、历史与社会、艺术等综合课的课程标准，也出版了多套教材。可是，回顾20年发展历程，相对于分科课程实施进展，七至九年级综合课程发展明显滞后。虽然在肇始几年，一些地方和学校还努力实施，但慢慢都逐渐退出，恢复了分科课程，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从国际基础教育发展而言，很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义务教育大多实施的是综合课程，而在我国综合课程很难落实甚至处于停滞状态。尽管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但不可否认，师资问题是绝大多数学校放弃综合课程方案的主要原因。

高校师范专业培养了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教师，但没有有意识地培养能够将三个学科打通的科学教师。可想而知，来自三个专业背景的教师想要上好科学这门课，无论对谁都存在不言自明的挑战和困难。科学课程如此，包含历史与地理两个学科的历史与社会课程也如此，包含了音乐和美术两个学科的艺术课程师资更是难以找到。如果翻阅现行的《道德与法治》教科书，不难发现书中有大量法律方面内容，如八年级下册几乎都是关于宪法的，而政治学科教师显然缺乏法律专业知识。种种迹象表明，打通高校师范专业学科壁垒，培养在实践中可以胜任的综合课程师资迫在眉睫。

国家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应统筹、规划中小学科学、艺术、历史与社会等综合课程师资培养任务，引导师范院校进行招生和培养。师范院校应在学校管理体制机制、专业设置、教学方式等方面进行改革，以培养综合课程的师资力量。针对过分强化专业、学科边界，所学专业单一、学科本

位特点鲜明，造成中小学教师视野狭窄、创新意识以及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较为薄弱的突出问题，高校应打通相关师范专业，改变单一学科教师培养模式。每个专业的学生应修读一定数量的相关专业课程。例如，历史专业的学生应必修一定数量的地理专业的课程，数学专业学生应修读几门物理或计算机专业的课程，化学专业的学生应修读一定数量的生物和物理专业课程，反之亦然，以让师范生具备开阔的视野和广博的知识。

新型师范专业应对教育新挑战

教师培养应着眼于教育“未来时”，今天的师范生是10年或20年后中小学教师的主力军，因而当下师范生的知识结构、能力素养直接决定着未来中小学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如何积极应对国家经济社会变革对人才培养的需求，如何优化和调整传统师范专业结构，如何提升师范教育支撑、引领基础教育的能力，日益成为师范院校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不得不应对的挑战。面向未来，中小学教师应该具备以下的专业知识和素质：深刻理解未来世界变化，深刻把握大数据、互联网时代教育特征，深刻洞悉绿色发展价值，具有认知科学与学习理念、复杂性思维和法治意识等等。

未来世界形势瞬息万变，新问题、新挑战与日俱增，要想应对这些困难和挑战，在激烈的国际教育竞争中取得领先优势，科学研判和系统增设新型师范专业势在必行。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认知科学与学习、系统科学、生态学、环境科学、法学等专业有必要成为新的师范专业，用以培养基础教育中具有智能智慧意识、认知科学与学习发展理念、绿色发展理念、法治观念等综合素质的教师。

2020年春季突发的疫情，让全世界中小大学教师都不得不实施线上教

学，仅仅一个多月时间就促动“互联网+教育”出现了新样态、进入了新阶段。规模之巨大始料未及，样态之新奇多样前所未有。线上教学在极短的时间内快速推动了课程内容及其呈现形式、教与学的方式以及评价内容与方法的变革。教师教育工作中应充分发挥互联网特别是大数据在教师培养和培训方面的价值，通过大数据刻画、呈现的学习过程与结果，可让师范生深刻地洞悉和准确把握学习行为、过程与效果，为将来的教学做更加充分的准备。

加大力度引导高校师范专业设置

目前高校大多以专业和学科为基础设置学部、学院和学系，在这样的管理体制中，学部、院系之间不愿打破专业、学科之间的壁垒，难以积极与其他专业合作，主动让出本专业的部分核心课程学分。教育行政部门不断加强高校学科排名、专业评估和认证工作，也给承担人才培养具体工作的学部、院系增加了越来越多的压力。如何保证本学科、本专业的排名成为最为核心的目标和任务，给师范专业的发展和调整带来了更大的困难和挑战。

建议教育行政部门高度重视师范专业建设工作，重新审视、界定师范专业，拓展师范专业的范围，增加一批兼师范专业，引导高校合理设置、调整师范专业。建议教育行政部门和师范院校研讨综合性课程师资培养的有关问题，借鉴其他国家长期以来积累的经验，对综合课程师资的培养目标、培养模式以及课程设置等问题进行深入研讨，尽快研制出台综合课程师资标准、培养方案。

同时，建议高等师范院校加强教学方式的改革，大力开展项目式学习，

以培养师范生综合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以拓展知识与实践的广度、深度。应设计一定数量的专题类或实验、实践类项目式课程，让学生围绕这些专题或实验实践项目，通过查阅资料、研讨交流、调查探究、实验实证、展示汇报等环节完成自己的学习。设置并实施这些项目，培养未来教师的问题意识、研究能力，从而将这样的体会和经验带到未来的教学工作中。特别是教师教育类课程，应让师范生充分体验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如多开展讨论、小组合作、案例分析、主题研讨等，创造更多的体验与反思、交流与讨论、展示与汇报等机会和情境，让师范生切实感受合作、探究学习的过程与实效，并逐渐养成习惯。

（《中国教育报》2020年5月11日，作者：郑国民）

增强大学生对不良思潮的“免疫力”

网上不良社会思潮和负面言论对青年学生的消极影响，值得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高度警惕。受疫情影响居家学习期间，长期活跃在“线上”，大学生更容易受网络上不良社会思潮碎片化、感性和娱乐化传播的影响。尤其是当前，各种反华势力利用疫情，不断向我国发出明枪暗箭，也助长了网上不良社会思潮的传播。因此必须有针对性地加强对青年学生的教育引导，增强大学生对不良社会思潮的“免疫力”。

不良社会思潮一般会借助网上热点话题影响网民尤其是青年学生。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网上热点如武汉红十字会、李文亮等话题不断，一

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些热衷传播不良社会思潮的人通过网络媒体、社交软件等积极介入热点问题的讨论，借机在互联网上争夺话语权。调查显示，疫情暴发以来，大学生经常关注网上热点话题，其中部分学生表示经常参与或转发相关热点话题的讨论。调研表明，特殊时期受紧张、担心、恐慌、焦虑等情绪的影响，部分学生在面对网上不同声音时，很容易接受一些偏颇甚至极端的观点，从而对不良社会思潮失去分辨力。

网上不良社会思潮对青年学生危害甚大。一是可能弱化、消解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给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增添了压力。如网络民粹主义者打着维护“草根”利益的幌子，利用疫情热点、泪点、痛点进行炒作，占据所谓“为民请命”的道义制高点，煽动不满情绪，消解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大学生年轻气盛，有强烈的责任感、正义感，容易在网上不良思潮的误导下，看不清全部或整体的事实，而对正面宣传和思政教育产生怀疑。二是可能误导少数青年学生养成不良社会心态甚至出现非理性表达。如网上的狭隘民族主义者，疫情期间散布嘲讽挖苦回国留学生和海外华人的不当言论，质疑我国采取的疫情防控政策和措施的科学性，甚至对中国政府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助力其他国家抗疫进行种种曲解。如任其发展，容易助长少数青年学生的虚骄社会心态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中国正在成长为世界性大国，在与国际社会良性互动的同时，难免会出现一些摩擦和冲突，这种不良社会心态很容易被利用，对社会的安定团结产生潜在影响。

面对网上不良社会思潮可能对青年学生产生的负面影响，高校思政教育必须努力巩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网络不良社会思潮往往观点片面极

端且缺少解决问题的正确路径，只要进行理性剖析，不难被揭穿。为此要鼓励思政课教师和高校的思政工作者积极撰写网文，对错误思潮主动回应，主动出击，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狭隘民族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粹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网上不良思潮进行批驳，引导帮助青年学生增强分辨是非的能力，巩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网上极端言论对青年学生产生负面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青年学生在分析社会问题时，因缺乏人生历练和社会实践锻炼，容易脱离实际产生完美理想主义倾向，因此高校思政教育应该拓展教育领域，更加突出实践教学，在社会实践中培育大学生的思考判断能力。

不仅如此，为增强抵抗网上不良社会思潮影响的“免疫力”，应积极引导青年学生认清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树立正确的国际观、大局观和角色观。这就需要以全球战“疫”为契机，加强对青年学生的国际视野教育，在培养国际视野、世界眼光和全球化的思维方式上下功夫。现阶段我国大部分高校主要依托开设“形势与政策”和“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选修课程对大学生开展国际视野教育，在教学理念、课程设置等方面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国际视野教育的效果有待提高。高校思政教育应将培育大学生的国际视野尤其是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纳入培养目标，深化思政课程改革，发挥课程思政的渗透作用，积极构建国际视野教育课程群，开设专门的国际视野教育选修课，开发优质慕课群等，在更大的视野中培养更加理性科学的价值判断力。

（《中国教育报》2020年5月21日，作者：杨芳 黄道峻）

把忧患意识融入国家安全教育

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精神传统之一。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关于忧患意识的诗词警句随处可见，如“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等等。这些经典字句穿越岁月长河，依然焕发着治国理政的智慧光芒。忧患意识不仅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精神力量，也是维护国家安全与实现中国梦的不竭动力。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这是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正式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时代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国家安全，深刻总结国家安全的基本经验，科学把握国家安全的内在规律，敏锐洞察国家安全形势的新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刻揭示了中国国家安全的本质，实现了我们党在国家安全理论上的历史性飞跃。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我们遇到的新问题、新矛盾就越多、越复杂；成就越显著、

越巨大，我们就越需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和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切实把忧患意识融入国家安全教育指明了方向。当前，在开展国家安全教育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宣讲党的理论、讲述党史故事和聚焦现实案例等方式切实把忧患意识融入其中。

通过宣讲党的理论把忧患意识融入国家安全教育。纵观党的理论成果，其中都蕴含着丰富的有关忧患意识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蕴含着为民族危亡而忧、为政治黑暗而忧、为人民困苦而忧、为党生存发展而忧等思想；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中蕴含着为国力不强而忧、为开除球籍而忧、为人民生活而忧等思想；邓小平理论中蕴含着为国家落后而忧、对国家统一而忧、对人民军队建设而忧、对人民贫穷而忧等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蕴含着为提升综合国力而忧、为改善人民生活而忧、为党的建设而忧等思想；科学发展观中蕴含着为发展而忧、为和谐而忧、为现代化而忧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蕴含的有关忧患意识的思想极为丰富，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以及党建等方方面面。通过宣讲党的理论，一方面，让人民群众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忧患意识的精神实质，是一种对国家民族的前途、人民的命运以及实现自身理想目标的使命意识，是一种清醒认识前进道路上的危险和困难的危机意识，是一种理性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底线思维；另一方面，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活动的政治认同，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国家安全教育的政治意识，从社会基层筑起抵御重大风

险与挑战的坚固防线。

通过讲述和学习党史把忧患意识融入国家安全教育。中国共产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产生了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无比强烈的忧患意识，形成了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曾经提到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作结论报告时，在讲“准备吃亏”“准备困难”时一口气列举了17条困难。在毛泽东看来，凡事从最困难、最坏处准备，努力去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样的思维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都是要始终坚持的，因为这是治党治国很重要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习近平总书记通过讲述党史，诠释了增强忧患意识的深刻道理，凸显了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意义。

通过聚焦现实案例把忧患意识融入国家安全教育。我们还可以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增强忧患意识和国家安全观念的重要意义。例如在分析我国政治领域面临的风险挑战时，可以评析西方势力一手炮制的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等事件；在分析当前党和国家面临的意识形态风险时，可以评析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事件；在分析当前我国经济领域面临的风险挑战时，可以评析中美贸易摩擦、广场协议、新冠肺炎疫情等事件；在分析我国科学技术领域面临的风险问题时，可以评析中兴芯片之痛、美国棱镜计划等事件。我们通过理性客观地点评现实案例，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受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自觉

地把忧患意识融入国家安全教育，为国家的长治久安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保障。

（《中国教育报》2020年5月21日，作者：王磊）

劳动教育是每名大学生的必修课

“我们班的菜园，一个超长寒假不见，都快荒芜了。原本准备这个学期种植有机花菜，现在还没开学，不知道还来得及不？”“去年我们种的油菜，都没看到开花，再过段时间直接可以收获菜籽了。”“我们班级负责的绿地，一个寒假过去，都长杂草了。现在开学了，我们一定好好养护照顾，让班级负责的绿地更加精致、美丽。”这两天，浙江农林大学各年级学生陆续返校，不少学生回到校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班级管理的草坪、绿地和农作园看看各种植物长得如何，一起盘算接下来种植什么农作物。

60余年鼓励学生参加劳动

前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强调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这条意见的发布，也引起了浙江农林大学广大师生的高度关注，大家纷纷举双手表示支持。

“在我们农学院，每个班级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浇水施肥，大家在地里劳动，感受劳动的意义。到了期末的时候，老师还会根据我们的劳动，进行打分，综合评价我们的劳动成果。我们也在劳动中收获友谊和成长，学会珍惜和感恩。”得知全国大中小学都要

加强劳动教育，浙江农林大学农学院大三学生曹宇钦对于开展劳动教育的意义，深有感触。

中美两位伟大的教育家确立的信条式教育命题，分别揭示了教育与生活的本质联系，即杜威提出的“教育即生活”和陶行知倡导的“生活即教育”。浙江农林大学从 1958 年建校第一天开始，就将劳动课设置为全体学生的必修课，使用锄头等工具更是当时农林学子必须掌握的技能。该校老校区的不少老房子、运动场，就是当时的学生共同参与的建设的。

进入 21 世纪以后，为更好地弘扬这一优良传统，浙江农林大学将学校所有的绿地分给各个班级管护，鼓励学生参与校园里的绿地管护、植树锄草等传统的体力劳动。与此同时，浙江农林大学还经常组织学生在校内农作园里参与挖番薯，割水稻，收大豆、玉米，播种土豆、油菜等各种农业劳动。如今，说起参加劳动、接受劳动教育，浙江农林大学不少学生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参加校园里的劳作，因为学校里专门有一个农作园，那是大家接受劳动教育重要的平台。

开辟农作园提供实践平台

和一般学生相比，在推进新农科的建设过程中，涉农高校的学生不仅需要学习高精尖的技术，更需要了解耕种节气、农作技能，培养对农业的情怀。为此，学校专门在校园里开辟了面积达百亩的学生农作园，并将相关土地分配给大一、大二农学类专业班级，鼓励这些班级的学生在菜地里种瓜种菜，利用课余时间管理菜地、开展生产劳动。为了更好地指导学生从事农业生产，该校还专门聘请附近农民，指导学生参与施肥、翻整、起垄等劳动生产，同时选育了各种果蔬的小苗，分配给学生耕种。

有了属于班集体的菜地后，学生们也就有了一个亲近自然、体验农作生活的机会，学校将栽培学、农作学、园艺设施学等课程开设于田间。如何经营管理好这块菜地，也成为了每个班级的同学共同关心的内容。有的班级按照学号组织学生除草、施肥、浇水，有的班级每周组织全班学生共同到菜园劳动，有的班级把菜地里种植的蔬菜尝试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也有的班级组织学生开展劳动竞赛……通过参与劳动，学生不仅增强了团队意识，也逐步形成了尊重劳动、感恩自然的良好氛围。

如今，每到农作园不少蔬菜成熟的时候，浙江农林大学农学院的“种菜课”考试也开始了：菜园管得好不好，菜种得好不好，同学们参与度高不高都是打分的依据。农专业的学生俞丹锋，从小到大没有干过农活，如今干起农活已经有模有样：“作为农专业的大学生，从事基本的农业劳动其实也是我们的必修课，通过参加耕种不仅学到从事农耕的基本技能，也提升了对农业的感情，而且通过集体参加劳作，还能够提升整个班级的集体荣誉感。”

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在加强学生劳动教育的探索中，浙江农林大学还连续多年实施学生暑期驻村劳动项目。学校与金华市各县区、杭州市临安区等地开展合作，利用暑假选派有志于从事大学生村官工作的学生，前往农村开展劳动。每年暑假一开始，学校就会选派一批学生“进驻”相关县市区的各个乡镇，开展“服务乡村振兴”等主题的大学生驻村劳动。

驻村劳动期间，他们结合自己的专业和兴趣，帮助村民设计庭院、深入茶园调研农村集体经济经营状况、指导农户开展垃圾分类、与村干部开

展五水共治、协助群众规划乡村旅游项目……通过与农民们同劳动、参与村务管理，深入调研农村情况、学习务农技术，他们在完成实践后要提交实践报告，最终可以获得两个实践学分。

现在已经是应届毕业生的陈佳敏，曾和同学们先后深入金华市黄宅镇的7个行政村，跟着杨剑等村干部参与当地的基层党建、美丽庭院规划、环境综合整治情况等工作，在和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中增长见识、了解农村。陈佳敏觉得，通过驻村劳动，自己不仅了解了农村的实际情况，最关键的是通过与普通农民一起劳动，培养了对农民的感情，树立了“知农、学农、爱农、志农”的理想信念，丰富了农村工作知识和实践体验。

对于组织学生深入农村基层开展驻村实习，指导老师叶斌表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为大学生搭建了一个干事创业、施展才华的大舞台，到基层就业创业会有更多发展机会。我们鼓励同学们到农村基层开展驻村劳动，帮助他们在劳动中掌握基层工作的知识能力、方式方法，具备在基层工作的综合素质，同样也有助于培养大学生对农民的感情，对于引导他们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将起到积极作用。”

劳动构成人才培养重要部分

随着劳动教育的持续开展，在浙江农林大学校园里，学生们各种劳动的平台越来越多，除了到农作园里种菜、暑假驻村劳动等，学校还将拥有3000多种植物、总面积将近3000亩的校园，全部“承包”给全校学生义务管护，鼓励学生在课余时间参加绿地管护、给花木施肥等各种劳动，将珍惜劳动果实、尊重感恩自然的美德传承下来。到了秋天，大家还可以扛起锄头挖番薯，拿起镰刀割水稻，伸出双手拔萝卜……在劳动中共享收获

的幸福。

随着时代的变化，近年来，该校劳动课程的形式也在不断转变：除了参加传统体力劳动外，学校还积极鼓励学生参与食堂卫生清洁、校园教室管护、文化氛围维护以及交通秩序维护、医院就医引导等社会劳动，对于在计算机等方面有专业技能的学生，积极鼓励他们以志愿劳动的形式，为同学们维修电脑等。学生们还可以根据参与劳动的时长，申请相应的思政类实践学分。

“教育可以生活化，也可以学习化，一直以来，我们坚持鼓励广大学生积极参加劳动，加强学生的劳动教育，也是学校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浙江农林大学校长应义斌十分支持学生参与各种劳动，“教育不能是空心的，不能没有根基没有生活，否则我们的教育就不会成功。我们一直鼓励学生参与各种劳动，就是让学生在劳动中学习到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在劳动中去认识自身价值，找到生活态度……”

应义斌表示，鼓励学生到农作园劳动、驻村劳动、参与绿地养护等形式的劳动，可以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的意识，更好地回应习近平总书记对涉农高校的回信精神，引导学生以实际行动践行“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强农兴农为己任”的要求。学校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余劳动，也希望学生能将专业学习与社会实践等第二、三课堂结合，增强学生奉献意识和动手能力，让学生养成热爱劳动、珍惜粮食的好习惯，能够在日常的生活中学会感恩社会、自觉践行核心价值观，能够在毕业后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成为推进中国梦实现的生力军。

（《中国教育报》2020年5月11日，作者：陈胜伟）

东北师大创建教师教育新模式

“请贵校尽快派实习生过来。”去年10月，在东北师大召开的“合作共建创新实验区研讨会”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副市长李鸿说，“我们保证让贵校的实习生享受市里最好的教育资源。”

十几年前，东北师大同很多师范院校一样面临师范生实习难的问题。而今，该校的实习生为何如此抢手？“我们最初联系实习学校时经常被拒之门外，中学即使勉强接收了，学生也没有太多实践机会。”东北师大教务处处长魏民说。自2007年国家师范生公费教育政策实施以来，东北师大创造性地提出并实施了“师范大学—地方政府—中小学校”合作（简称“U-G-S”）教师教育新模式，并以“教师教育创新实验区”为实践承载，共建实践育人共同体，历经13年，走出了一条“三方密切合作，深耕实践育人”之路。

构建实践合作育人共同体

“创建‘U-G-S’教师教育实验区，是我们主动提出来的。”东北师大教授高夯说，“这样一来，学校师范生教育实习不再难，中小学教师培训不再难，大学教师教育者科研不再难，实现了三方共赢。”

实验区建立伊始，东北师大便设计了置换研修、顶岗培训、影子培训、校长论坛等活动，从教育教学到行政管理，全方位地帮助实验区提质升级。不仅如此，学校还派出专家学者到各实验区调研，根据各实验区需求，制定不同的提质方案。“专家学者们轮流把先进的教育理念送上门，帮助我们解开学校发展和新课改中遇到的难题，东北师大是真正把实验区的事情

当成自己的事情在做。”辽宁省法库一中校长张文栢说。

随着合作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与中小学校加入实验区，东北师大的学生源源不断地深入实验区各个基地学校进行实习。

目前，“U-G-S”教师教育创新实验区的发展规模已覆盖全国 13 个省份、44 个县市的 219 所优质中学。在实验区布局不断扩大的背景下，东北师大聚焦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及当下教育热点、难点，鼓励各实验区加强交流互动，以东北师大为纽带，使实验区由一个个孤立的点连成网络，为不同区域的基础教育资源信息实现优势互补提供了便利。

“同课异构”是两个或多个实验区经常进行教研切磋的方式之一。安达与林甸实验区于 2015 年结成互助对子，已开展了多次同课异构活动，涉及语文、数学、英语、政治等多个学科。“这些活动接地气，教育资源开放，对提升基层教师的综合素养和教学水平很有帮助。”安达进修学校刘国友校长说。

推动实践教学信息化

只凭实习结束时的一份总结，难以准确评价学生的实践质量。从前的实验区只在东北三省，实地督导学生比较方便，现在范围扩大到全国，实地调研检查的成本大大提高了。“2015 年起，东北师大重新构建了‘基础实践+应用实践+研究实践’分阶段、一体化的教育实践体系，全程化过程监控成了难题。”曾从事过十多年教育实践指导工作的王秀红老师说。为了提高教育实践质量，由东北师大自主研发的数字化实践教学平台应运而生。

学校依托平台，将实习划分为感知、理解、应用和总结四个阶段，在

不同阶段给学生设置不同的任务。学生在实践过程中通过平台分阶段上传实习资料，大学指导教师随时可以进行线上审阅，教务处及各学院（部）也可以远程监督学生和指导教师的工作进展情况。

这样一来，学生的实践过程就被“摆到了桌面上”，学院（部）组织的教育实践评价小组对学生的实践质量评定有了充分、可靠的依据，评定结果也更为客观和精准。

实践教学平台的作用不止于此，一方面，以大数据为支撑，平台在实践前后分别对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不断积累实践数据，每年都会依托数据撰写实践教学质量报告，以供研究和改进，更好地促进学校实践教学的质量改进。另一方面，平台设置“实践成果”模块，对学生上传的优质实践任务案例进行展示，产生朋辈效应并积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我们不仅要把这一平台打造成管理学生实践的数字化平台，还要使其成为服务于学生的数字化学习工具。”东北师大教务处副处长王向东说。

平台上设置了专家报告、名师讲堂、基础教育名师论坛等模块，总计384663个优秀教学资源和相关视频，为实习生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和专业的理论指导。“从前实习生只能到网络上找优秀教案等相关资料，现在我们在平台上就可以查到本校学长学姐们在各个实验区实践时留下的优质资料，这些资料无疑更贴合我们的实践，更具有针对性。”物理学院姜佳漫同学说。实践教学环节的改革，提升了毕业生的教学能力，缩短了正式上岗的职业适应期，为乡村教育源源不断输送新鲜血液。

（《中国教育报》2020年5月14日，作者：赵准胜 闫冬）

思政课有备而来，教与学里应外合——记 海南师范大学思政课改革

海南师范大学近年来在思政课建设上积极探索，在教师成长、授课方式、学生培养、考核方式等方面做了一系列有益尝试，形成了“五导一体”思政课程建设模式，有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积极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觉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

团队作战呈现优质课堂

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优质的备课是优质课堂的基础。为了改变教师个人“单打独斗”造成的课程内容安排不合理、课程质量不均衡的状况，海师大思政课推行团队教学，由课程专家和授课教师共同组成备课组，集思广益，共享教学资源，不仅保障了同一门课程内容上的统一性和质量上的均衡性，且有利于师资队伍尤其是青年教师的培养。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组建了以专家为指导、全体授课教师共同参加的集体备课组，共同研究制定科学合理的教学大纲与教学进度，面对面讨论具体重点难点与授课方式，在交流与磨合中总结改进，不断完善课程体系。

思政课的课件和讲稿均实行分工负责制，即先由每位教师在课程专家指导下完成1—2个专题的课件和讲稿撰写任务，然后进行集体试讲审核，讨论定稿后供所有任课教师使用。同时要求每位任课教师主攻1—2个专

题，成为专题主讲人，帮助青年教师快速积累教学经验。

在不断打磨课程的过程中，一批优秀的青年教师迅速成长起来。

“通过集体备课、磨课，我的教学能力得到提高，从一名教学新手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思政教师，对上好思政课建立起了信心。”2017年海南省思政课教学大赛一等奖获得者谢丹老师如是说。

海师大创设以问题为导向的专题教学模式，依据教学大纲和教材内容，精心设计并打造优质思政课专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设置了以下专题：“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并运用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日益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世界观？”等等。

各专题教学内容又设计了若干相互联系的具体问题，设置上做到层次鲜明、逻辑清晰，内容上达到引起学生兴趣、层层深入探究的效果。以资本主义专题之“资本怎样来到人间”为例，通过设置“资本与金钱有何不同？”“创造价值的要素有哪些？”“新知识、新科技能创造价值吗？”等多个具有一定难度和挑战性的问题，用问题引导、启发、探究、阐释课程理论，引起学生兴趣并使其参与到问题讨论和质疑中来，形成教师引问、学生追问、师生合力解问的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探究循环，在不断启发中让学生水到渠成得出结论。

问题导向的专题教学转变了学生对思政课“高高在上”的固化印象，对学生关切的问题做出及时回应，将思政课打造成为与生活息息相关的、鲜活的话语体系，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亲和力和针对性。同时，不同教学专题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构成一个逻辑系统，保持了思政

课程体系的整体性。

课内课外让位学生主体

海师大思政课改革力求突出学生对课程的参与度与体验性，提升学生获得感。通过小组合作学习、课堂自主探究、实践教学活动等方式，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到思政课各环节，并将思政课的教学从课内延伸到课外。

课内，授课教师在教学班进行分组，每组一位组长，负责记录本组考勤和课堂发言、组织自主研讨，与其他组长共同组织研讨结果交流展示，通过组长带动组员参与课程教学。开展课堂自主探究，教师根据学生普遍感兴趣的或是存疑的问题确定各组自主探究的内容，由学生自行组织研讨，最后形成总结发言或报告并由教师点评。开展实践教学活动，通过经典原著读书心得分享、自制主题微视频、举办社会热点问题研讨会等形式激发学生探究兴趣，运用多元化的课程活动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展示平台和自觉成长的机会。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学院每年都汇编优秀本科生与研究生的原著读书报告，举办学生制作的优秀课程微视频展播。

课外，组织学生开展社会调查，参与社会志愿服务活动。每个假期组织学生到不同地区开展社会调研和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学院在青海省海东市化隆县金源乡下科巴村设立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基地，连续三年组织学生利用寒暑假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支教行动。支教条件虽然艰苦，并没有降低学生的工作热情。他们认真地备好每一节课，完成每一个调研任务，勇于担当，在磨炼中实现了自我成长。

2019年暑假，马克思主义学院组织青年观察团，以“看大荒巨变，见中国发展”为主题，跨越近4000公里，远赴黑龙江垦区进行了为期12天

的调研活动，学生直观地感受到了大美龙江的风采，也深刻领悟了“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的内涵，切实感受了新中国 70 年来的发展变化，升华了爱国情怀。

为更好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学院还组建了以学生为主体的学术类社团——海南师范大学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协会。社团面向全校学生开展学术活动和实践活动，并开设微信公众号“海师青马菁英”，用最受欢迎的方式把最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成果和社会热点问题推送给学生。

任课教师定期给予学生活动指导，马克思主义学院给予资源支持，学生自主完成。学生的主体性得到充分发挥，保持课程参与度和兴趣度的同时对课程的认同感、获得感及学习主动性均有显著提升，为思政课程模式创新提供了有效途径，促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有虚有实、有棱有角、有情有义、有滋有味。

《手册》具化反映教学成效

为实现思政课的规范化建设，确保所有教学环节落到实处，海师大马克思主义学院编制了《学生学习手册》，将所有教学环节细化、书面化，以便监督管理。《手册》内容包括教学计划、专题设置、授课教师信息与各环节的师生角色任务。将学生学习任务融入教学计划，细化到每次专题课前需要准备的学习材料和思考的问题、专题讲述结束后的延伸讨论参考思路、自主探究的主题以及各组学生的任务分工等。《手册》上清晰呈现了学生对每次专题、自主探究的任务完成情况和学习心得，每学期上交 3—4 次，教师根据完成情况进行评价，评价结果纳入本门课成绩。通过《手

册》，教师可掌握学生的课前准备、课后讨论情况，发现学生学习中的难点和知识掌握的薄弱环节，并及时给予解答和指导。

在考核当中，海师大思政课突出过程主导，考核指标覆盖课程全过程，评价体系更加多元化、科学化。平时表现、期中考核和读书报告均在《手册》中呈现，教师根据《手册》评定成绩，优秀的读书报告还有额外的加分和奖励，有效激发学生完成各教学环节任务的主动性。

2018级小教英语专业学生李俊颖在《手册》中写道：“《共产党宣言》是我阅读的第一篇马克思原著，篇幅不算很长，竟然包含着这么丰富的内容，可以说字字珠玑。我明白为何把这篇文章作为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了，因为文章吹响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号角。”

全覆盖的考核评估体系科学、客观地反映思政课教学的整体效果，也为思政课成为学生主动学、乐于学的课程提供了有力保障。

海师大思政课改革创新自启动以来，通过提升教学质量、创新教学方法、突出学生主体地位和加强过程管理，不仅提升了思政课的教学效果，同时促进了教师与学生教学相长、共同发展。思政课教师在不断思考提升教学质量、实践教学改革的过程中，得到了良好的锻炼，教学能力明显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尤其是经典原著阅读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课堂教学和组织能力得到明显提高。

创新“五导一体”课程模式，是海师大思政课落实“思维要新”的具体实践。“五导一体”课程模式以增强学生学习体验为主线，精心设计课前准备、课堂教学、课后延伸所有环节。专家指导提升教师的备课质量，问题导向、教师指导、《手册》督导、过程主导凸显学生主体性，通过教

师与学生的共同努力，实现师生一体共同发展的目标。

（《中国教育报》2020年2月3日，作者：陈红）

武汉大学：打好课堂保卫战

2月17日，武汉大学线上“开课”第一天。课表上的各门课程如期亮相，教师们化身网络主播，直播间就设在教师所在的异地、国外、山村，或者抗疫一线的战场上。

武汉大学全心谋划教学工作，时刻铭记“大学的根本是培养人”。截至近日，武汉大学开出线上本科教学课头数4110门，1848名教师授课，学习学生共计23182人、204067人次；研究生课头数689门，在线教学率达95.17%，公共必修课在线教学率达100%。疫情期间，教师通过各种方式陪学伴研，确保学生宅家学习效果不减。

医者亦师者，树立神圣榜样

疫情面前，武汉大学附属医院成为战“疫”主力军。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中南医院是新冠肺炎定点收治医院，同时承担着雷神山医院、武昌方舱医院、武汉客厅方舱医院的抗击任务，此外还负责多家疫情定点医院的支援与指导工作。他们带着新时代高校贡献社会、服务人民的神圣职责，怀着治病救人、大爱无疆的医者仁心，坚决守护人民健康与生命。

进入新学期后，附属医院的医生们在“医者”之外，履行起“师者”职责。2月17日，武汉大学医学部的3270名本科生，在网上课堂与他们

日夜牵挂的老师“相见”。

第二临床学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刘汉兴，在抗疫一线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住院痊愈后隔离观察。正月初五，他收到学校下发的网上开课通知，主动请缨，为临床一线的同事分担教学工作，主讲这学期的本科生神经病学课程，并发挥信息技术特长，辅助学院制作视频录制攻略，远程辅导老教师录课。

刘汉兴的这份坚守，与妻子田钰如出一辙。田钰是武汉大学第二临床学院急救中心护士长，至今坚守岗位。夫妻俩一个战斗在ICU，一个战斗在隔离间，用实际行动书写着医护伉俪的爱国情怀。

疫情时期，临床学院的医生们，除了医者身份，他们还是教师、医生家属、党员突击队成员、志愿者等。在每一个角色的主战场，他们都发挥超稳。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吴开松教授，白天奋战在抗疫最前线，晚上进行课前准备、录播教学视频；检验科李一荣教授、郑芳教授刚刚完成实验室新冠肺炎诊断检测，来不及喘息一下，就开始了直播；超声科周青教授、皮肤科雷铁池教授在坚守临床一线的同时，精心准备各种教学资源；“损伤与反应”课程的主讲教师刘焰结合炎性风暴，讲述了自己救治危重病人的经历。

师者，也是医者。他们是疫情抗击中勇敢的逆行者，是医学生成长路上的提灯人。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着“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的誓言，给医学生树立了可亲可敬可学的榜样。

在武大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医学研究生。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他们向

学院提交“请战书”。学院经过深思熟虑，把他们派上战场，叮嘱老师们为准医生上好这一门实践课。

2018级呼吸内科专业博士研究生赵东和同学们走向战场，发出新时代青年的强音，“我们既是‘准医生’，更是共产党员，此时此刻我们义不容辞。”

儿科专业的专业硕士研究生们，与老师们一起，日夜守护在患儿身边。“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我们与老师并肩战斗，我们有信心！”2017级儿科专业硕士研究生张宏达说。

前赴后继，绝不退缩。他们，成了很多病人眼中点燃希望的那盏灯。

疫情当教材，担当融入教学

现实就是最鲜活的教材，能激起学生从感性到理性的思考。武汉大学的教师们将疫情变成教材，将责任担当融进专业教学，让线上课程成为生动的专业课和深刻的思政课。

“假如每个社区（小区）都要设计临时的隔离空间，怎样兼顾空间设计、患者心理关注、建筑创意、交通流线等需求？”城市设计学院青年教师周俊为2019级建筑类本科生讲授“建筑设计基础”时，将本学期的课程主题确定为“事件与空间——‘新冠肺炎’社区隔离空间设计”，启发学生思考大事件对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的影响。

1665年，伦敦暴发鼠疫，剑桥学生牛顿暂避老家。躺在老家的苹果树下，牛顿被苹果砸中，有了后来的万有引力定律。“瘟疫不见得全是坏事，也许能开启重要的科学发现。同学们在此期间，有新的发现吗？”国家教学名师、武汉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主任李建中教授，通过“历史上的著名瘟

疫事件”开篇，引导测绘学院的大一学生思索：在抗疫时期学习人文导引，独特的意义在哪里？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孟颖颖在“公共危机管理”课程中，带领学生对疫情期间的公共危机管理展开研讨。孟颖颖的同事周晓明副教授，与学生们分析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被定性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国际法提出了哪些挑战。生命科学学院开设的通识课“微生物的世界”，涉及新型冠状病毒等相关知识，激发学生热烈讨论……

疫情暴发后，武大测绘学院空间信息工程研究所公共安全团队的 20 余人，投入到了紧张的科研之中，每周一次线上例会，研究如何采用 GIS 技术、数据挖掘与大数据分析等专业知识，服务疫情防控。

测绘学院 2019 级研究生吴冲是该团队的编外成员，春节期间，他发挥专业所长，用短短 3 天时间完成了一套疫情防控与病情监测系统，并已在贵州三穗县试点应用，满足政府“外防增量输入、内防存量扩散”的疫情防控需要，“这套系统不仅能有效减少排错、排漏，帮助地方政府提高排查检测的工作效率，还能实现更加严密的防控措施，科学地提高防控效果”。吴冲跟团队里的老师们请教，进一步优化软件，希望将其做成应急管理平台，在疫情过后继续发挥作用。

隔着山与海，如约“课上见”

“今晚我就像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李侠，头戴着耳麦、手拿着鼠标，通过 QQ 将通识课“西北地区水资源与生态环境”的信息，传递到了全国各地 160 位同学的身边。”水利水电学院谢平教授的调侃，让同事们莞尔一笑。

突如其来的疫情，将老师们阻隔在四面八方，如何“搭建直播间开始上课”变成一个现实命题。

首先面对的是技术难题。对许多老教师来说，这是他们的第一次线上授课，“老”教授面临“新”挑战。他们习惯了纸质化的阅读研究、面对面的授课方式，并不依赖信息技术手段。学校推出《虚拟教室上课简易操作流程》，各学院自制“攻略”，教师们团结起来互相帮助。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系 59 岁的陈芳老师，利用手机和借来的平板电脑，在年轻老师的帮助下首次“触屏授课”顺利进行，取得了如期的授课效果。

珞珈在线虚拟课堂、QQ 群、微信群、腾讯会议、腾讯课堂、钉钉、学习通……老师们善于总结，资源共享，成功摸索出预案应对网课平台拥堵，学生们自觉担任“监督员”，转场时指挥调度，网络教学越来越顺畅。

“老师太会了！”“老师太讲究了！”“感觉老师这个操作过于熟练了！”病理生理学教研室尹君老师在给八年制学生上“神经科学”课时，采用的平台很稳定，自身操作非常熟练，甚至在课间播放大白系列的眼保健操，让同学们惊叹不已。

客观条件上的不便产生不少故事。历史学院年轻教师吴兆丰在经历了连夜送父亲去合肥住院、赶回村里遇到停电之后，紧张得胃都痛了，好在开课传来了电，吴老师如有神助，两节课一气呵成。信息管理学院吴永贵教授被阻隔在乡下老家，在第一次课中，他除了顺利直播精心准备的课程，还意外直播了乡下的鸡叫。

一名学生给吴永贵留言，“这鸡叫得中气十足。”吴永贵幽默地回应，“这是一句饱满有力的评语，我愿意把它看成一个隐喻，不管是在鸡的王

国，还是未来人的世界。”

被阻隔在乡下的授课教师的网络课堂，会有不经意的“野趣”增加笑谈，消除学生对老师的敬畏感，平添一份亲近。而在远隔万里、带着时差的外教课堂上，师生获得了新的体验与思考。

哲学学院的托马斯·贝施（Thomas·Besch）教授在澳大利亚的家中，无法返回学校。这一学期承担了两门研究生课程，其中一门是“专业外语”。托马斯将班级拆分为四个小组，每组5—6名学生，授课时间按照每组半个小时进行分配，使得学生能够最大程度地与授课教师进行互动。托马斯教授称，他效仿了在牛津大学读博时小组指导（Group tutorial）的教学方式。

“虽然相隔万里，看到托马斯教授的那一刻，非常亲切。我们保持着一贯的认真、活跃和思考，跟以前一样。”哲学学院研究生吴航说，顺利开启的第一课让他仿佛回到了熟悉的校园。

老师们从一周的教学体验中，开始思考如何利用线上技术改进线下教学。文学院副教授肖圣中认为，线上授课优点较多，比如，学生可以反复观摩视频，师生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更多，学生的思考更加深入。“当下很多学生在实体课堂不敢不愿表达，但在线上课堂却很活跃，这是新时代大学生的一种发声方式，也是我们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新趋势。”

（《中国教育报》2020年3月2日，作者：肖珊，程墨）

深度融合是在线学习的关键——访华南师大博士生导师钟柏昌、詹泽慧教授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发展，近日，教育部下发通知，要求全国大中小学 2020 年春季学期延期开学，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在疫情流行期间原则上不举办大型聚集性活动和考试，各培训机构也按要求取消各类线下课程。随后，各地陆续发出延期开学通知，以保障广大中小学生的健康与安全，作业帮、学而思、新东方、猿辅导等各大培训机构均相继推出了免费在线学习课程。

延期开学和线下培训取消后，孩子的学习究竟应该怎么办？记者日前就此话题对华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钟柏昌、詹泽慧进行了网络访谈。

作为正式学习的在线学习，应做好与学校教育的深度融合

记者：在这个特殊时期，在线学习已经从学生和家长的自发行为、校外培训机构的 market 行为，催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免费在线学习热潮，在线学习从边缘走向中心，不仅获得了“合法”进入“校内教育”的机会，也成为当前家长和学生可以依赖的主要选择。目前，在线学习过程中有哪些问题需要多方协同，将采取哪些更为有效的方式进行化解？

钟柏昌：就当前而言，无论是教育部的“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项目，还是各大出版社的电子音像资源，以及各类学校和培训机构开发的网络课程，都积累了海量的优质数字资源，可以说，如何保障和提高延期开学期间的在线学习效果，主要问题不在于优质教育资源的缺失，而在于

使用方法的改善和优质资源的整合，其核心问题可以归结为“融合”二字，并由此需要追溯从业人员的观念改变。

随着网络的普及和在线教育的发展，人们的学习方式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学校教育或线下培训，随时随地通过多样化的学习工具、学习资源开展学习已经是人们普遍的学习方式，即与正式学习相区别的非正式学习。长期以来，在线学习只是作为一种非正式学习方式对待，正式学习依然局限在学校教育中。如果说以前的校外培训（含线上、线下两种形式）与校内教育（主要为线下教育）是“井水不犯河水”，那么本次大规模长周期的疫情，将模糊两者的界限。在线学习与学校教育是融合而非取代与被取代的关系。只有做好两者融合融通，学校才能确保在线教育的效果，在线教育企业才可能在新一轮的“洗牌”中立于不败之地。

詹泽慧：实际上，目前大部分学校和企业只是试图做到“停课不停学”，还未有效破解“停课不停教”的问题。比如说，诸多的免费公开课，均试图与校内原计划的课表进行衔接，也号称采用名师授课，但实际上大多数为广播式教学，尽管效果要好于录播等静态课程，但其实际效果依然无法乐观估计，主要原因在于无法真正与校内教育有效衔接，也难以做到个性化、差异化的施教。有一部分学生不愿意参加此类在线课程的学习，其原因不仅有课程的適切性问题，也因缺少学生熟悉的校内教师的介入，缺少约束性和临场感，难免产生抗拒心理和应付心态。因此，单纯依靠平台或家长的力量是不够的，体制内教师的作用不可或缺。

钟柏昌：不难看出，这种免费课的运作模式，本质上依然停留在非正式学习或校外培训的运作理念，依然是培训机构主导的在线学习。在线学

习从非正式学习转换为正式学习方式，这种角色和功能的转换，更需要相关主体的积极跟进，将学校和教师推到前台，即从正式学习的角度做好在线学习与校内教育的有效衔接和融合。企业行动很快，但不可一厢情愿，要紧紧密结合学校教育的实际需求；学校被动应对，也不可被动接受，要主动消化吸收在线学习的优势。

记者：要做好“停课不停学”，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学校、教师和家长作为主体，如何参与到在线学习与学校教育的融合融通的工作中，真正发挥好在线学习所获得的正式学习的功能？

钟柏昌：一种可能的思路是“教育行政部门—学校—教师—家长—企业”的多方联动模式。其中，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提供政策和经费保障，鼓励学校利用在线学习平台开展线上授课，组织学校开展教师培训工作，尽快适应全流程和全员参与在线教学方式。学校应根据自身需要选择合适的在线教育平台，与企业紧密配合将线下班级和课堂迁移到线上，构建空中课堂，利用平台和学校自有资源开展线上教学，开展制度化的线上正式教学活动。教师要充分利用在线平台，采用静态课程和直播课程、线上学习和混合学习、直接授课和翻转课堂等多种方式开展教学和辅导，利用平台的分班、分组功能采用班级集体授课、小组合作学习和个人自主学习等不同学习方式。尤其需要家长做好在线学习的设备支持和学习监督，包括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的指导等。

詹泽慧：就在线教育企业而言，不仅可以获得改变学生学习习惯的机会，而且对未来线下招生将起到积极作用，成为收割生源“流量”的最佳窗口期。因此，面对这样一个新机遇，提供线上学习服务的在线教育企业，

需要进一步“走进”学校，了解校内教育的需求。例如，目前诸多在线学习平台可以提供免费直播课程，但鲜有与校内教育直接对接，即便是行动较早的教育机构，也只是告知学校能满足小班制、大班额等多种空中课堂的需求，而对整建制、全流程的空中课堂的构建与管理等功能缺少支持。在线学习所获得的正式学习身份，也并非只是线下课堂的简单搬家，企业更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发挥正式学习的体制优势和在线学习的资源优势、数据优势、教学结构优势，显然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钟柏昌：总之，大规模、长周期疫情对正常教学秩序的干扰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一些通过周末调课、暑假补课等方式减少延期开学的影响，本质上是一种被动的事后应对策略，而将在线学习与制度化的校内教育深度融合，将在线学习当作学校教育的主渠道填补延期开学的不足，则是一种主动的前置应对方案，应当作为特殊时期的非常手段，尽快规划、加快实施，以便在各地原计划的正式开学日之后开展制度化的线上教学活动。

作为非正式学习的在线学习，需要遵循“加减乘除”法则

记者：在遇到新型冠状病毒这样的疫情时，在线学习依然会持续扮演非正式学习的角色，从这个角度看，如何寻找适合每个学生知识基础的学习资源，真正做到个性化学习，避免重复学习和无效学习，需要注意哪些学习法则？

钟柏昌：我们觉得，应该特别注意“加减乘除”这四个要点。

“加”的法则，指的是合理规划，结合分配率与结合律，科学分配线上线下和各学科的学习时间，查漏补缺，强化学习上的不足之处。此外，也可以增加相关科学素养和信息素养的教育。例如，关于疫情的网络信息

铺天盖地，真假莫辨，信息过载严重，容易导致误信虚假信息和无意识的传谣行为。因此，要减少信息过载的不良影响，就要学会过滤和鉴别信息，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讨论各种真实和权威信息的来源渠道，归纳信息真伪的交叉验证方法，批判性分析信息内容的内在逻辑和科学性等。这些素养和能力，对学生学习能力的提高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促进。

“减”的法则，指的是资源的理性选择。疫情期间，诸多平台都推出了免费学习资源和课程。开放的资源虽多，对学生个体而言，却不一定是好事，如上述信息过载的问题同样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需要学会做减法，挑选适合自己的资源。一旦确定要学习的课程后，不要三心二意、轻易改变，避免“猴子下山式”的学习，否则只会浪费时间，导致学习的碎片化和重复化。

詹泽慧：“乘”的法则，指的是善用各类学习工具，进行自我学习管理，或参与同伴的互助互学。在线学习的过程可能会比较枯燥，且由于师生时空的分离，学习者容易产生孤独无助感，学习动力可能较面授学习要低，借助在线论坛进行同侪互助和知识共享，往往能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同伴间相互督促、相互碰撞产生思维的火花，可以实现“ $1+1>2$ ”的效应。

“除”的法则，指的是学习效果的监测上，应强调学习效率。在线学习时间并非越长越好，否则也会影响视力和健康，以及注意力漂移问题。无论是家长还是学生，都需要特别注意在线学习时间长度和周期的合理安排，避免出现在线学习的“形式主义”沉迷。

总之，疫情期间，在线学习是对孩子们学习规划能力、自控能力、自主学习能力的锻炼。遵循“加减乘除”法则，有助于学生在疫情期间

有序、合理、有效地安排学习。

（《中国教育报》2020年2月8日，作者：黄蔚）

全面二孩政策下如何加快构建托育服务体系——基于全国十三个城市的调研与思考

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问题是众多家庭关注的焦点，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托育服务的供需关系更为紧张。如何加快构建托育服务体系、增强家庭获得感？扎实的调查摸底是前提。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研究所（系）所长洪秀敏团队，受国家卫生健康委的委托，对全国13个城市的婴幼儿照护服务供需现状进行调研，并从加大托育服务资源供给、加强托育人员队伍建设、保障职业女性就业权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中国教育报独家刊发该调研的阶段性成果，供读者参考。

调查背景

脑科学、儿科学、发展心理学及教育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和国际社会的诸多改革实践均表明，出生1000天是个体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科学优质的照护服务不仅有助于促进婴幼儿健康成长、家庭和谐幸福，也有助于提高生育率与女性就业率，促进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科学育儿理念的不断提升，家庭对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的重视程度和需求也日益增强。但是，伴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工业化、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家庭结构小型化、女性普遍进入劳动力市场，

加之单位制托儿所解体后对生育和家庭照料的支持大幅减少，原有的福利性托育体系基本瓦解，婴幼儿照护已成为许多家庭面临的现实问题，育龄母亲在工作与育儿之间寻求平衡日渐困难。“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家庭生育意愿并未得到完全释放，无人带养、托育服务供给不足，已成为影响城市家庭生育两孩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如何更好地解决家庭婴幼儿照护难题，已成为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和民生保障亟须破解的重要课题。

带着对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的关注，笔者于 2017 年获批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面二孩政策下城市地区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研究（17ZDA123）”，两年多来，课题组深入研究各国托育服务的探索经验，并对我国代表性省市的有益探索开展了实地考察，积累了大量的调查经验和数据资料。2019 年 5—10 月，课题组受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委托，对北京、南京、上海、太原、郑州、昆明、成都等 13 个城市开展了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供需现状调研，与 107 名行政管理人员（包括省、市、区卫健委及街道社区代表）、84 名托育机构负责人深度座谈与访谈，对 28582 名 0—3 岁婴幼儿家长、2340 名托育人员、541 名托育机构负责人开展问卷调查。

在调研过程中，课题组成员深刻感受到了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以来婴幼儿照护服务的较快发展。《指导意见》以需求和问题为导向，倡导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婴幼儿家庭照料的支持和指导服务，对确有照护困难的家庭或婴幼儿提供必要的托育服务，更精准、更全面地补齐民生短板，

满足了广大百姓婴幼儿照护服务的向往。与此同时，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了《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托育机构管理规范（试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了《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试行）》等政策文件，一方面对托育机构的登记和备案管理做出了明确要求，为托育机构规范发展与管理提供了政策依据；另一方面，积极回应托育机构的需求，从中央和地方层面均给予了“真金白银”的政策支持，推进落实托育服务机构优惠政策，大大激发了社会力量举办托育服务的积极性和活力。

然而，由于托育服务尚处于起步阶段，仍面临着幼无可托、养育无助、母职受阻三大突出瓶颈。一方面，对有托育需求的家庭而言，现有托育服务资源难以满足广大家庭对优质普惠、方便就近托育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对家庭为主的婴幼儿照护而言，支持体系尚未建立和完善，母亲工作和家庭育儿平衡面临巨大挑战。

调查结果

托育服务资源匮乏，家庭择托难现象突出

第一，托育服务资源有所提升，但总量依然不足。本次调研显示，当前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达到了5.5%，与2016年国家卫计委（现更名为国家卫健委）调查的4.1%相比，已经有了明显提升。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2017年，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0—2岁儿童平均入托率已达到32%，丹麦、比利时、冰岛、法国、以色列、荷兰、挪威等国入托率已超过50%。此外，在托育服务资源总量不足的情况下，现有托育服务资源远难满足家庭需求。调查显示高达68.4%的家庭

有入托需求。其中，2—3岁入托需求高达82%，1—2岁入托需求有13.5%，1岁以下入托需求有4.5%。

第二，择托难问题突出，质量低、收费高、位置远成为三大难题

调查显示，68.4%的家长表示在选择托育机构时存在较大困难。其中质量低、收费高、位置远成为择托三大主要难题。

首先，托育机构发展不规范，师资质量有待提升。在择托难的原因中，近半数家庭（44.7%）表示由于“优质托育机构资源少”而不愿意让孩子入托。一方面，托育机构发展不够规范。由于工商部门和民政部门过去无托育机构注册名目，托育机构在注册时只能注册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教育咨询公司、培训机构等，导致超范围经营现象突出，身份亟待合法化。此外，托育机构设置不合目前标准的现象突出。一是部分机构户外面积不达标。依据住建部2019年最新修订的《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17.6%托育机构室外面积不满足人均3平方米的标准，有12.1%的托育机构没有户外场地。二是存在大班额现象。依据《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规定的最大班额标准，乳儿班、托小班和托大班班额应分别不高于10人、15人和20人。而调查显示，乳儿班未达标的有22.2%，托小班未达标的占比为34.2%，托大班未达标的比例高达59.1%。三是配餐难。调查发现，75%的托育机构可以自行行为婴幼儿配备餐点，但25%的机构面临着有资质且就近的婴幼儿配餐公司少，食品难保障。

另一方面，托育人员师资建设发展滞后。随着科学育儿理念的推广，家长对托育师资有了更高要求，不止满足于对婴幼儿的日常看护，更期待专业化的人员队伍对婴幼儿健康发展、早期启蒙和科学育儿进行指导。但

当前托育人员队伍建设发展滞后。一是资格证书混乱。由于国家尚无专门针对 3 岁以下托育人员的资格证，当前保育员证、育婴员证、婴幼儿发展引导员证、幼儿园教师资格证等均可作为上岗凭证，证书五花八门（见表 1）。同时，现有资格证適切性不足，除保育员外，各类托育人员的职业资格均面向家庭或幼儿园，难以适应 3 岁以下婴幼儿的发展特点和保教方式。二是师资供给紧缺，低师幼比突出。依据《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中规定的师幼比配备标准，乳儿班、托小班和托大班保育人员和婴幼儿的比例应分别不低于 1:3、1:5 和 1:7，而调查显示，乳儿班未达标比例高达 77.8%，小托班未达标比例为 35.4%，大托班未达标比例为 37.5%。

其次，托育服务收费高昂，家庭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有 56%的家庭表示当前托育服务费用太高；仅有 44%的家庭表示可以接受。在家庭的育儿成本上，当问及育儿成本中感觉到压力最大的方面时，有 20.1%家庭表示用于购买托育服务的支出压力大，仅次于住房压力（28.3%）和日常生活支出（26.3%）。研究发现，当前家庭用于托育服务费用上的平均支出已达到家庭总收入 12%左右。其中，托育服务支出比例占总收入 5%以下的家庭仅有 30.5%，占总收入 6%—10%的家庭有 31.7%，占总收入 10%—20%的家庭有 24%，占总收入 20%—30%的家庭有 9.3%，还有 4.5%家庭的托育服务费用达到家庭总收入的 30%以上。

最后，超过八成托育机构服务半径不达标，直接影响家庭的便利感。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时间被赋予越来越高的价值，服务是否便利会直接影响人们的满意度。对于托育服务更是如此，由于婴幼儿的年龄特点，家庭更加需要方便就近的托育服务。而调查发现，15.3%的家

庭认为离家远是当前择托中的最大难题。根据《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的最新要求，托儿所的服务半径宜为 300 米以内。调查发现，仅有 15.2%符合要求（在 300 米以内）。有超过八成（84.8%）的服务半径不达标，其中 22.3%家庭选择的托育机构离家距离为 300 米—500 米，有 34.6%的家庭表示托育机构离家距离为 500 米—1 公里，还有近 1/3（27.9%）家庭要将孩子送去 1 公里以外的地方入托。

内外部支持不足以满足家庭的育儿需求

当前婴幼儿照护以家庭为主。调研发现，在家庭内部支持上，普遍存在父职缺失的现象，来自祖父母的帮助占比最高（53.9%），其次为外祖父母（33.3%），还有 12.8%会获得其他亲属的支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延迟退休政策的逐步落地，以及祖辈在子女生育第二个孩子时年岁增高，健康状况下降等情况，家庭支持网络弱化，过去传统的老人照看孩子的方法将难以为继。当家庭开始生育二孩时，家庭内部支持祖辈明显减少，仅为 27.02%。同时，外部支持也严重缺位。调查显示，家庭养育压力较大，70%的家长表示担心孩子健康状况不良，60%的家长担心孩子发展较慢。近 1/3 的二孩家庭还期望组织一些针对二孩教育的育儿讲座，帮助二孩妈妈答疑解惑，丰富育儿知识。比如：如何对两个孩子针对性地教育、如何平衡对两个孩子的爱、如何解决两个孩子之间的矛盾等。但是，目前即使占比最多的亲子活动享有人数也未过半数。此外，在线父母课堂平台、入户指导等支持上覆盖率均不足 20%，25.4%的家庭反映没有享受任何育儿支持和指导。

育儿工作难平衡，女性职业发展面临巨大挑战

调查发现，婴幼儿的养育会给女性职业发展带来巨大的困境和挑战。在生育期间单位灵活安排工作时间的仅有 35.9%，享有育儿补贴家庭比例也仅有 1/3。在所有全职在家的女性中，34.4%的女性是婚后一直为全职家庭主妇，而在生育孩子之后却有高达 59.2%的女性迫于现实压力而回归家庭。目前脱产婴幼儿父母重返工作岗位的支持最低，无论提供就业信息服务，还是提供就业指导和职业技能培训，均在 10%以下。

首先，二孩家庭母亲面临更大的职业冲击。调查显示，81.2%的家庭表示生育二孩会影响母亲职业发展，其中有 54.9%的家庭表示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26.3%的家庭表示会严重影响职业发展，极大地冲击职场与照顾家庭间的平衡关系。

其次，低收入家庭中的母亲更易离开职场。在低收入家庭中，全职妈妈比例最多，占比 68.7%；中等收入家庭中全职妈妈比例为 24.9%；而高收入家庭这一比例仅有 6.4%。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难以承受婴幼儿高昂的保姆费，尤其是在母亲收入低于保姆的情况下，很有可能放弃职业发展，回归家庭全职照顾孩子。

最后，低学历母亲，更易中断职业回归家庭。初中及以下学历全职妈妈的比例最高，占 39.7%；高中/中专学历全职妈妈占比 29.8%；大专学历全职妈妈占比 18.%；而本科及研究生学历全职妈妈分别仅占 10.8%和 1.4%。

对策建议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党的十

九大报告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蓝图中，将“幼有所育”排在首位。民心所向，是深化改革的主要方向，人民满意是改革成效的重要衡量标准。针对当前广大家庭对婴幼儿照护服务的需求和资源供给不足、家庭育儿支持不足的突出矛盾，亟须加快构建婴幼儿照护家庭支持体系，真正让千万家庭“敢生、能养”，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满意感和幸福感。

加大托育服务资源供给，形成多元规范发展的托育服务供给格局

首先，应充分发挥多方优势，大力扩充多种形式的托育服务。在具体的供给模式上，一是以社区为依托，按照社区适龄人口数，合理规划和布局，就近就便为社区内居民提供小规模、“喘息式”的普惠性社区托育点及亲子活动设施；二是发挥工会组织作用，鼓励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以单独或联合相关单位共同举办的方式，为职工提供福利性托育服务，有条件的可向附近居民开放；三是引导并支持社会力量针对家庭的不同需求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普惠性托育服务；四是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等。其中，尤其要加大扩充老百姓期待的照料和教育功能相结合的托育服务资源，同时增加2岁以下托育服务的资源供给。

监管与扶持并行推动托育机构规范优质发展

一是设门类，严准入。尽快完善注册登记和备案制度。各地应在市场监管和民政部门审批中增加托育机构注册的专门类别；同时充分借助互联网手段，建立托育服务信息管理平台，实现多部门开办手续“一网办”。在经核准登记后，由相关审批负责部门通过管理平台向卫生健康部门推送《托育机构备案信息表》，切实推动落实备案制度。二是增扶持，促发展。采取建设补贴、运营补贴、以奖代补、税费优惠、水电气优惠等形式支持

普惠性托育机构发展。三是强监管，促规范。严格执行《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和 2019 年最新修订的《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确保托育机构设施建设规范化；依托信息化手段，对机构进行及时监管和业务指导。

加强托育人员队伍建设

其一，应尽快建立健全托育人员资格准入制度，完善相应的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和考试标准。其二，应加快扩充托育人员队伍。一方面通过将托育人员作为急需紧缺人才纳入培养目录，引导职业院校、高等院校增设婴幼儿照护服务相关专业等，扩大不同类型、层次学历托育人员招生规模。另一方面加强托育人员的在职培训，尽快研制托育人员培训课程体系与指导标准，专项启动国家级托育机构负责人和托育人员能力提升计划，逐步实现全员轮训，保障托育人员队伍质量的持续提升。其三，应切实提高托育人员的工资待遇，制定托育人员最低工资标准，落实“五险一金”基本社会保障，增强职业吸引力，稳定师资队伍。

加强对家庭婴幼儿照护的支持与指导，营造家庭友好照护环境

首先，形成夫妻同工、祖辈适度参与的家庭内部动力机制。当前，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以家庭为主，母亲担负着主要的照护责任。需进一步引导核心家庭内部成员共同参与婴幼儿照护服务。一是应积极发挥父亲在婴幼儿照护中的重要作用。营造父亲参与的良好环境，引导父亲意识到参与子女照护的作用与深远影响，积极与妻子一起共同积极参与育儿过程。二是对祖辈提供支持和服务，适当促进祖辈的积极参与。可借鉴国际经验，为祖辈隔代抚育提供抚育津贴等经济支持；开展一些祖辈喜闻乐见的学习

培训、咨询辅导等活动，为促进祖辈高质量参与家庭教育搭建平台，形成两代父母优势互补的家庭教育合力。其次，加大对家庭婴幼儿照护的外部支持与指导。一是应尽快制定出台育儿补贴配套政策，以减缓家庭的照护压力。二是依托街道、社区、托育机构，通过亲子活动、家长讲座、入户指导、线上 APP 等方式为家长提供育儿指导，开展宣教普及工作，提升家长育儿理念与能力。

保障职业女性就业权，缓解育儿与工作发展的矛盾冲突

在根深蒂固的传统家庭分工思想，以及自身受到的多元文化观念的影响和冲击下，职业女性承受着来自社会、工作和家庭的多重压力。为此，必须要加强女性就业保障，促进男女职业发展的平等。一是应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就业原则，增强女性就业权保障制度的可操作性。二是政府应试图平衡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权益。从市场角度出发，通过立法、制定政策等手段完善配套政策，用一定的公共政策作为补偿，减缓女性因抚育孩子而给企业造成的损失或不利影响。政府可根据女员工规模及年度生育情况，实行一定的税收优惠以降低企业生育成本，三是对于已经离开岗位、回归家庭的女性，可通过实施就业服务专项行动、开发公益性岗位等措施支持女性重返工作岗位。与此同时，要加大对二孩家庭、低收入以及低学历母亲的关怀和支持，着力解决此类群体面临的更为严峻的婴幼儿照护难题。一方面，要加强对低收入、低学历母亲职业中断的支持和指导，切实缓解此类家庭的婴幼儿照护负担；另一方面，相应的女性就业支持政策应充分考虑到“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二孩家庭所面临的经济、养育及社会适应等风险，深入研讨二孩家庭职业女性内在压力机制，注重负性生活

事件对多孩家庭养育的广泛影响，通过给予倾斜性的政策扶持提高二孩家庭养育者的抗风险能力及应对压力的抗逆力。

（《中国教育报》2020年2月1日，作者：洪秀敏）

何谓 SCI 和 SCI 论文?

SCI (Scientific Citation Index) 是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 (ISI) 编辑出版的引文索引类刊物, 创刊于 1964 年。分印刷版、光盘版和联机版等载体。印刷版、光盘版从全球数万种期刊中选出 3300 种科技期刊, 涉及基础科学的 100 余个领域。每年报道 60 余万篇最新文献, 涉及引文 900 万条。

SCI 论文是指被 SCI (Scientific Citation Index), 即科学引文索引所收录的期刊上刊登的学术论文。我国科技界对 SCI 论文概念模糊, 小部分研究者误认为 SCI 是一本期刊, 此期刊由南京大学引用并成为各大高校和科研机构学术评价和奖惩的一类刊物。

发送范围：校领导、学校中层领导干部

江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院

通信地址：南昌市紫阳大道99号

邮政编码：330022

办公地点：实验楼5楼

联系电话：88120870
